

Summer 2011



# 亚洲研究动态

## Asia Research Network

June No.13

2011年6月 第十三期



## 出版人

金在烈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 编委会顾问

周其凤 北京大学校长  
顾秉林 清华大学校长  
陈佳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程 伟 辽宁大学校长  
金柄珉 延边大学校长  
Mai Trong Nhuan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Tserensodnom Gantsog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理事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王孙禺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友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朴灿奎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ren Davaa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郭栖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主编 郭栖霞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韩慧英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 特稿



- 04 第七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在扬州召开
- 06 “上海论坛2011”举行
- 08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2011年度理事会

## 研究进展



- 09 美国中期选举后奥巴马执政前景与中美关系
- 13 论中日民间外交对当代中国公共外交的借鉴
- 18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亚洲几国货币政策的比较研究
- 30 亚洲公立大学法律治理比较研究
- 35 近十年美国的中国民俗研究概况

## 研究机构

- 39 全英中国学研究所



## 第七届中国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 在扬州召开



2011年4月22日至24日，由扬州市政府、扬州大学、复旦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在扬州召开。来自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论坛”、“上海论坛”等1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60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崔致远、鉴真：东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扬州在古代东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崔致远、鉴真就是两位曾在扬州生活过，并在东亚文化交流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在中国设立的10个亚洲研究中心，是当代中韩文化交流的体现，是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的延续，本次会议的主题——“崔致远、鉴真：东亚文化的

交流与融合”与举办地扬州的结合为会议主旨作了完美诠释。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长金在烈、复旦大学副校长许征、扬州市副市长董玉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董玉海市长表示，扬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是扬州发展最重要最宝贵的资源。地处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扬州形成了开放、包容、创新的文化特征，铸就了扬州在中国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特别是在东亚经济和文化交流当中的特殊地位。著名的鉴真和崔致远就是在推进东亚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代表人物。此次召开的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是各个亚洲研究中心交流的高层平台，来自各个亚洲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齐聚扬州，共同追忆鉴真和崔致远这两位伟大人物在东亚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历史功绩，共同探

讨、研究东亚经济和文化交流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扬州的骄傲，也是扬州的荣幸。这次会议将进一步推动东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强东亚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丰富亚洲研究的队伍。

许征副校长在致辞中表示亚洲研究中心致力于亚洲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选择扬州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举办会议，力图使会议充满独特的文化气息，从住宿、饮食、行走等方方面面，使每一位参会代表能时刻感受到东亚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它巨大生命力。最后，许征副校长向出席本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为会议成功举办做出贡献的扬州市人民政府、扬州大学表示了感谢。

开幕式后扬州大学副校长周新国发表了题为《从崔致远、金沧江在中国的境遇看中韩文化的交流》的演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发表的报告题目为《从江淮到东瀛：鉴真大师的文化之旅》，两位学者分别就为古代东亚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两位伟大人物做了精彩的诠释，得到与会者和学生的热烈反响，为此次会议奠定了良好的基调和氛围。

22日下午，国内亚洲研究中心成员集聚一堂，就各中心的工作进行了交流。此次会议侧重特色工作的汇报，如中国传媒大学的亚洲传媒论坛已形成独具特色又颇有影响力的品牌论坛；辽宁大学则依托区域优势，着重建设和发展东北亚论坛；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以搭建亚洲研究学术信息平台为己任，积极筹建“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而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则致力于发挥复旦人文学科的优势，着重于亚洲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从以往多学科的亚洲研究向重点研究领域倾斜，从自由申报课题向规划课题招标式转

变，以形成特色研究和系列研究。其他亚洲研究中心也就特色建设进行了阐述和交流。

此次会议还有一项特殊的环节，即青海民族大学何峰校长专程赶赴扬州参会并颁发捐款证书。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牵头各亚洲研究中心纷纷通过青海民族大学为地震捐款，此次会议，何校长特地对财团及各亚洲研究中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表示感谢。

金总长在总结发言中敞开心扉表达了对亚洲价值和探寻的理想和不懈努力的决心，他认为西方研究东亚的学者对于东方文化及价值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而亚洲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在于正确地定位亚洲的价值以及促进亚洲价值的发展，通过十年的发展，亚洲研究中心应该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认识和定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上，总结过去所做的，考虑以后该做的，在此基础上再一同讨论下一个十年的规划，到时将会有有一个更积极的态度寻求下一个十年的目标。为更好的支持各中心的研究和业务，财团今年将设立亚洲研究院，更好地建构合作网络，更好地沟通和完善工作。

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最初在中国成立亚洲研究中心至今已有10年，资助的访韩学者在亚洲范围内已超过了500名。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此次会议显得尤为重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会议最后讨论决定下一届主任会议的主办单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此次会议的召开得到了扬州市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 “上海论坛2011”举行

2011年5月28日上午，“上海论坛2011”在上海西郊宾馆隆重开幕。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顾海良、上海市副市长赵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韩国SK株式会社副会长兼首席执行官崔再源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副校长桂永浩主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帕尼帕迪(Supachai Panitchpakdi)、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大卫·格林纳韦（David Greenaway）、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校长马克·斯蒂芬·赖顿（Mark Stephen Wrighton）、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校长爱德华·阿克顿（Edward Acton）、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英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弗格森·斯基（James Ferguson Skea）、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纽约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大卫·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代表出席了论坛。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市场、政府和全球治理结构”（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oice of Asia: Market, Government and Global Governance）。

开幕式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帕尼帕迪（Supachai Panitchpakdi）、英国能源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弗格森·斯基（James Ferguson Skea）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在三天的会期里，与会代表分别围绕“亚洲的合作与治理”、“亚洲的人口城市化战略与劳动力市场整合”、“金融与货币：危机之后的创新与监管”、“危机后货币、贸易与投资的全球治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理论研究与历史比较”、“亚洲经济低碳化的技术愿景与机制设计”等分论坛议题展开了广泛、多维和深入的研讨。





此外，本届论坛还设有“杜伦大学专场：公司治理与投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创新”、“创新战略与产业发展：危机后的竞争与合作”、“可支付住房：政府与市场的责任划分”等四个圆桌会议。

5月30日上午，“上海论坛2011”圆满闭幕。Mark S.Wrighton教授、吴志攀教授、金在烈先生、David Stasavage、郑永年教授分别在闭幕式上做了精彩的演讲。

闭幕式上，与会代表经过讨论，通过了《上海论坛2011共识》。《上海论坛2011共识》对“亚洲的合作与治理”、“亚洲的人口城市化战略与劳动力市场整合”、“金融与货币：危机之后的创新与监管”、“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理论研究与历史比较”等议题进行了阐述。

《上海论坛2011共识》认为：亚洲之路，是富强之路，也是探索之路、改革之路、创新之路。在目前的后危机时代，迫切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在全球视野下共同探讨全球治理结构问题，并加强各国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以建立合作、开放、共赢的世界经济秩序。节能减排是当前全球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亚洲地区更为重要。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在，在产生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引发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重要转折，并进而影响各国内部乃至亚洲经济格局的转变。

《上海论坛2011共识》指出，当前不仅需要在政府

主导的政策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来实现各国的节能减排，而且需要加快低碳技术研究，重点加强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包括推广使用工业减排技术，建设新能源电力产业与智能电网，设立建筑行业低碳发展标准，降低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并加强节能减排技术政策制定方面的国际合作。

上海论坛是由复旦大学主办、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赞助的国际经济论坛。今年举行的是上海论坛第六届年会，六届年会共吸引了约18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作为“学界、政界、商界”三方交流互动的平台，上海论坛以“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为宗旨，邀请各界精英领袖开展对话与合作，力求就当今全球经济和国际局势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多维和深入的研讨，为亚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提供视点和建言。

本届论坛吸引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CCTV2、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报、瞭望东方周刊、解放日报、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东方早报、新民周刊、香港文汇报、新加坡联合早报、读卖新闻、新浪网、东方网等几十家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另外，本届论坛主办方还首次采用了微博直播，并在会前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微研讨”。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2011年度理事会



2011年6月22日下午，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2011年度理事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中心理事长杨学义、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中心副理事长金莉，理事蔡剑峰、郭栖庆、张西平、张朝意、赵宗锋，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部部长康泰硕和项目官员张希领出席。会议由副校长金莉主持。

中心理事长杨学义首先致欢迎辞，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向金总长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与感谢。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郭栖庆向理事会作了题为“建设亚洲研究学术信息平台，凸显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的核心功能”的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自去年理事会议以来中心的各项工作，并汇报了下一年度中心的工作计划。在会上还演示了“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详细介绍了数据库的内容、数据特色、检索方式、语种资源建设以及数据库开通后可实现的功能。

与会理事对中心一年来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经过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2011年度理事会会议工作报告》，并围绕“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的建设情况、中心今后的工作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围绕“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副理事长

金莉从数据库的语种类别、界面、信息量等建设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能够建设成为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最权威的数据库。

金在烈总长在讲话中肯定了一年来中心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他指出，数据库建设是一项大事业，要通过多种渠道做好“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的数据收集，与世界知名的亚洲研究机构或高校图书馆建立链接关系，实现资源共享，让专家学者获取到通过其他渠道无法得到的信息，真正发挥信息交流平台与信息窗口作用。金总长表示，财团会大力支持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工作。

理事长杨学义在总结讲话中表示，中心一年来的工作卓有成效，“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凸显了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的核心功能。他鼓励中心把数据库建设成为“信息更新快、内容实效性强、学术含量高、数据语种覆盖面广、信息容量大”的特色数据库，全面实现“亚洲研究学术信息数据库”的信息传播功能。同时，理事长杨学义代表学校诚挚邀请金在烈先生及财团其他同仁前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建校70周年庆典活动，共同见证北外辉煌时刻。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 美国中期选举后奥巴马执政前景与中美关系<sup>1</sup>

张颖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 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共和党从民主党手中获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民主党则仍是参议院的多数党，但优势有所减弱。本文论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即中美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但中美之间仍有不和谐之音，中美之间经贸摩擦频发，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也影响了中美关系。本文也分析了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认为美国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不会有大的改变，但美国会在对华政策方面做些调整，使其更加理性、更加务实。

**【关键词】** 美国 中期选举 中美关系



2010年11月，美国进行了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力量对比发生较大变化。美国中期选举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中美关系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如何解析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趋势？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分析研究，以求得出合理的结论。

## 一、美国中期选举结果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10年11月4日上午8时，共和党在此次美国中期选举中，总共占据了国会众议院全部435席中的239席(选前为179席)，民主党获得186席(选前为256席)。共和党借此次中期选举增加了60席，成为自20世纪40年代末杜鲁门政府以来在众院赢得席位最多的一次选举。此次参院改选后，民主党目前在全部100席中占52席(选前为57席)，共和党占46席(选前为41席)，尚有两席未有结果。

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失利，民主党的优势有所减弱，共和党的力量增强。共和党从民主党手中获得了众

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是共和党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斩获，仅用四年就中止了民主党在众议院的主导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令选民感到不满。共和党人抓住这种情绪，在中期选举中取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则仍是参议院的多数党，但优势有所减弱。民主党在1994年失去了在众议院长达40年的控制权。仅仅12年后，民主党赢回了控制权。而现在，才过了4年，共和党又将控制权夺回。选举结果表明，美国民众对奥巴马的变革并不满意。奥巴马在今后两年或将调整策略，以重新赢得民心。作为总统，奥巴马在外交政策方面仍掌握相当大的权力，尽管奥巴马的政治操纵能力被削弱了。

## 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一方面继续同中国“接触”，致力于同中国建立长期、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关系，共同应对地区安全与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没有改变前几届政府所实行的在安全领域防范中国的既接

<sup>1</sup> 本文为作者在“美国中期选举与奥巴马执政前景暨美国的亚洲政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该会议为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会议资助项目。

触又防范中国的双重政策。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之初继续了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中美关系开局良好。在伦敦参加G20金融峰会期间，胡锦涛主席会见了奥巴马总统。这是两国领导人第一次会晤，取得了十分积极的成果。首先，双方领导人为两国关系定了位，即中美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这一定位显然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第二，双方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对话分两个“轨道”：由戴秉国国务委员和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负责“战略轨道”，由王岐山副总理和盖特纳财长负责“经济轨道”，他们都是双方国家元首的特别代表。过去的战略对话在美国只是副国务卿一级，现在提升到国务卿一级，而且是作为总统的特别代表，可见现在的对话较之过去提高了级别。<sup>2</sup>2010年5月24日至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两国重量级高官不仅在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上前所未有，而且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内容丰富，影响深远。2010年5月13日，中美人权对话重新启动。此前，2002年和2008年，由于小布什政府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中美曾两次中断对话。

随着奥巴马摒弃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他于2010年5月22日宣告了一项基于外交接触和国际联盟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表示：美国将会“坚定地强化那些对我们帮助很大的联盟”，同时也将设法“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制定更强有力的国际标准和制度”。他说：“这种接触本身不是最终目的。我们所寻求的是能解决我们时代挑战的国际秩序。”<sup>3</sup>2010年5月27日，奥巴马总统向国会递交了其上任以来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奥巴马在这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呼吁将伙伴关系从传统的美国盟友扩展至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目的是同美国共同分担国际责任。<sup>4</sup>

虽然奥巴马政府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需要同中国接触，并同中国进行了合作，特别是合作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但在军事方面美国始终防范中国。2009年3月25日，美国国防部不顾中方的反对，发表了《2009年中国军力报告》。该报告虽然强调与中国接触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对中国军力的渲染夸大，强调“中国对军队武器的发展将用来威胁和攻击台湾，并打破了美国在中国附近地区的海空优势”。<sup>5</sup>2010年3月上旬，美国间谍船“无瑕号”在中国的海南岛南部，约75海里的海域，收集有关中国的各种情报。2010年6月23日美国在夏威夷海疆开始组织“环太平洋2010”军事演习，演习一直持续到8月1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法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荷兰、秘鲁、韩国、新加坡和泰国等14国海军参加。这次规模空前的演习，主要目的是防范地区大国的挑战，防范中国。韩国“天安舰”事件发生后，美韩在日本海和黄海进行了多次军演。名为“不屈意志”的军演，系美韩系列军演中的第一个。美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20余艘军舰，8000多名人员参演。2010年8月8日，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参加美韩联合军演后，抵达越南中部岘港附近的南海海域。8月11日，美国和越南海军在岘港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搜索救援训练。岘港与中国海南岛和西沙群岛隔海相望。8月16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与中国有关的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称，中国正在迅速推进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国对台湾的军事优势正在扩大，而且大量投资发展弹道和巡航导弹能力，这可能在未来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统治地位构成挑战。美国正在太平洋岛屿关岛建造耗资80亿英镑的超级军事基地，以遏制中国增强军力的行为。扩建项目包括一个给核动力航母使用的码头、一套导弹防御系统、实弹训练场以及对该岛空军基地的扩建，这将是美国自二战以来对西太平洋军事基地最大的一笔投资，也是数十年来对海军基础设施的最大投入。<sup>6</sup>

2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Press Secretary, "Statement on Bilateral Meeting with President Hu of China". [April 1,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

3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Commencement" [EB/OL]. [May 22,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west-point-commencement>.

4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B/OL]. [May 27,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5 Defense policy under Obama Administration Continues U.S. Military Global Dominance [EB/OL]. (April 2, 2009) [April 3, 2009]. <http://www.projectcensored.org/articles/category/featured-articles-editorials>.

6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0年10月25日报道。

美国还投入另外的1.26亿英镑用于改善印度洋英属迪戈加西亚岛上的基础设施（美国在印度洋的海空军基地）。迪戈加西亚岛在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空袭中起到了发射台的作用。这里已经存放了美国海军的海上预置部队三分之一的备用装备，这些装备可用来支持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的军事部署。

奥巴马已从向中国提供“战略再保证”的模糊想法转为向美国的盟友提供保证的具体政策，保护它们不被中国增强的军事所威胁。继2010年7月初希拉里在河内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反对中国控制南海之后，奥巴马会晤了东南亚领导人。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得到加强，如美国联手日本应对中国。日美两国外长9月23日在纽约举行会晤时美国曾提议加强磋商，探讨如何应对中国大规模提升军事实力后在国际社会迅速增长的影响力。美国正重返亚洲，正加大对中国周边的影响力。

2010年年末，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以及国防部长盖茨兵分三路出访亚洲，行程都是围绕着中国周边国家——奥巴马访问印度、印尼、韩国及日本四国；希拉里除了访问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还访问了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有报道指出，“美国围堵中国的布局，主要是构筑一个海上包围圈，从东方的日本到南海，再从南海到印度，封锁中国东进和南下之路，并遏制中国海权的发展，有人称之为C形包围圈。”<sup>7</sup>奥巴马亚洲之行凸显遏华色彩。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亚洲之行返回美国，在回程的记者会上说，对亚洲之行的印象是亚洲各国持续希望美国的介入。而新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在亚洲之行最后一场记者会上，则再度重申奥巴马政府将亚洲列为战略优先的政策，他说奥巴马此次出访就是为这项政策的下一步而铺路。<sup>8</sup>

尽管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存在重大分歧，总体看来，中美两国还是能够进行比较稳定地协调与合作的。在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不断增加。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构想是与中国合作，美国在许多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尤其需要同中国的合作。在能源、气候变化、反恐等其他重大全球问题上美国也依赖同中国的合作。总的来说，奥巴马就任总统后，中美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但是中美关系之间也有不和谐之音，奥巴马上台后，在最初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后，中美之间也时有冲突发生，如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中美之间经贸摩擦频发，此外，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也影响了中美关系。2010年11月17日，美国国会超党派对华政策咨询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负责就如何处理中美经济和军事关系向国会议员建言献策。它每年都向美国国会递交相关年度报告）公布了2010年的年度报告。报告敦促国会把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呼吁美国议员对中国贸易政策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因为后者伤害到美国利益。在报告中，该委员会说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以保持庞大的对外贸易顺差，这严重拖慢了美国经济。这表明中美在金融领域的摩擦加剧。

需要指出的是，南海问题成为中美新的磨擦点。美国频频插手南海问题，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南海自然海区达到350万平方公里，中国实际控制的海区为44万平方公里，占16%，南海群岛58%被越南占领，马来西亚控制10%，菲律宾控制16%。201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宣称：

“南海问题是美国优先解决的外交事务，南海航行自由事关美国国家利益。”中国也强调，南海主权问题与台湾、西藏和新疆问题一样，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把维护这些地区的领土完整当成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课题，不可能对其他国家有任何的妥协。20多年来，中国推行对外政策时一直保持低姿态，其遵循的是邓小平说过的一句名言即“韬光养晦”，而今，随着中国财力与实力的不断壮大，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更具胆魄，在“与时俱进”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调整政策。

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加强军事联系，大规模地搞军事演习，加剧了中国周边局势的紧张程度。美韩联合军演，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参加美韩联合军演后，和越南海军在岬港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搜索救援训练；美日联合军演，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公开支持日本。2010年10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日本外相原诚司在夏威夷举行了会谈。就钓鱼岛问题，希拉里称：“我愿明确重申，尖阁（中国名称：钓鱼岛）属于安保条约第5条的范围。我们重视保护日本国民的义

7 《美国堵中国新布局》，香港《信报》11月15日报道。

8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1月15日报道。

务。”<sup>9</sup>中国现在已将钓鱼岛划归核心利益，这将意味着中国不会在与钓鱼岛相关的问题上容许任何妥协。美国的公开表态一方面增加了地区冲突的复杂性，同时也给中美关系带来阴影。2010年12月3日开始的美日大规模联合军演，不但出动了“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而且美日军演包含了钓鱼岛周边海域，还首次以中国为假想敌。

### 三、美国中期选举后奥巴马执政前景与中美关系

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两党在国会的力量对比，民主党失利虽然将制约奥巴马未来执政，对奥巴马政府未来两年的执政将产生重要影响，但对中美关系大的格局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当然，在对华政策优先议题的考虑上，会有一些影响。中美关系将会更加趋于理性化、更加务实。

从性质上看，两党都属于资产阶级政党，但党员和支持者的成分不同，其政策主张也有所不同。从整体上看，民主党内自由派比较多，其成员往往属于少数民族或者各族、工会会员、工薪阶层、非新教徒。它比较注意代表中下阶层的利益，支持采取社会福利措施来改善国内穷人的状况，如目前奥巴马政府进行的保险制改革，比较重视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主张对大企业进行政府管制，更强调民主和人权。在对外政策上，它一般奉行自由主义，但赞成限制贸易以保护就业。如2009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为奥巴马时代中美贸易第一案定论。13日，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启动“双反”立案审查程序。共和党内保守派较多，其成员往往属于白人、中产阶级、新教徒。它倾向于中上层的利益，更注重维护大公司的经济利益，主张限制政府对大企业的约束，强调法律与秩序。在对外政策方面，它奉行保守主义，喜欢采取强硬路线。一般说来，民主党比较注重人权问题，强调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传统。如克林顿政府时期，多次拿中国的人权问题说事，指责中国缺少人权。共和党较为重视实力，主张加强军备，属于现实主义流派。如小布什政府时期，重视实力，强调军事力量。

1. 选举结果表明美国民众对奥巴马的变革并不满意。奥巴马在今后两年或将调整策略，以重新赢得民心。作为总统，奥巴马在外交政策方面仍掌握相当大的权力，尽管奥巴马的政治操纵能力被削弱了。

2. “两院分治”将对其未来执政之路形成掣肘。在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势头强劲，不仅夺回众院多数党地位，而且在民主党原本占优的参院也扩大了“地盘”。而执政的民主党只保住了在参院的微弱多数党地位，“两院分治”格局已经形成。

3. 奥巴马今后执政之路会否顺畅，最关键还要看美国经济形势能否好转。而考虑到目前美国低迷的经济状况和严峻的就业市场难以在未来两年内出现实质性好转，奥巴马今后施政之路不会平坦，竞选连任也存在很多变数。

4. 这次选举结果将使奥巴马谋求与共和党进行跨党派合作成为其推动改革的重要途径。

5. 传统上共和党人注重坚持自由贸易，中美间的经贸关系不会出现大问题，比如小布什时期中美经贸就相对“顺畅”。共和党的传统理念更“亲贸易”一些，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会有所缓解。不过，共和党也比民主党更注重军售与国家安全，一贯主张提升对台关系。在诸如对台军售等议案上可能会较易通过，也有可能造成中美关系新的摩擦。

6.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中美关系都不会有大的改变。原因在于，中美关系是建立在彼此互利互惠基础之上的，与中国进行合作而不是对抗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无论哪个党派在国会中占据优势，都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不过，美国也将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使其更加趋于理性化、更加务实。改善并加快推进中美关系应该是奥巴马政府在中期选举后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只有真诚地合作，“同舟共济”，持续地推进相互关系，才会对两国未来的发展有利，对世界发展有利。

总的来说，美国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不会有大的改变，但美国会在对华政策方面会做些调整，使其更加理性、更加务实。

<sup>9</sup>《希拉里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 日方“倍受鼓舞”》，[http://news.china.com/zh\\_cn/international/1000/20101029/16214215.html](http://news.china.com/zh_cn/international/1000/20101029/16214215.html).

# 论中日民间外交对当代中国公共外交的借鉴

温南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 公共外交是一种官方主导和推动而以民众为受体的外交形式，其实践古已有之，但从理论层面上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则是在二战之后，并且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近年来，中国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努力和成绩都有目共睹，但是其中的问题和挑战也颇多。本文旨在从中日自1945年之后的民间外交实践中寻找经验，以期对中国当代公共外交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中日民间外交 公共外交 借鉴 实践

## 导论

公共外交 (public diplomacy, 又译作公众外交) 作为一种外交实践古已有之，但从理论层面上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则是在二战之后，并且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实施的积极而广泛的公共外交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术语，首次出现是在1965年，当时美国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系主任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 将其定义为：“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sup>1</sup>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对于公共外交有过这样的阐述：有一方是公众就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实质是公众参与的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层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媒体是主角。<sup>2</sup>然而在这里需要阐明的是，“公共外交”并不等同于“民间外交”（或民际外交，civil diplomacy）。公共外交是以公众为受体的外交形式，是以一国政府为支持和主导的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而民间外交则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外交形式。事实上，新中国自从1949年成立之后，政府间外交和非官方

形式的外交几乎同时开展了起来。在1957年，周恩来总理就曾经对中国的整体外交有过界定，即“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这足以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非官方的外交形式的重视。

## 中国公共外交的现状与挑战

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奥运火炬传递、“3·14”事件、“毒奶粉”风波，再到“七·五”事件、王家岭矿难等等，近年来中国形象在国际上多次遭遇危机。一系列外交摩擦中，非政府领域冲突往往先于政府间分歧爆发。国际社会的反应和舆论对政府的行为构成了巨大压力，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一个接一个的难题，这样的局势就给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学界和政府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也迫切希望改善国际形象。“公共外交”在这一背景下被中国的领导人寄予厚望。相对传统的政府间外交而言，由于公共外交更多地强调以公众为对象，实施主体虽然包括政府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一般包括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因此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从而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表现本国的国际形象。

1 公共外交的定义，<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919200.htm>。

2 《公共外交通讯》创刊号。

近年来，中国在公共外交方面着实做了一番功课，在资金、人力和公共外交形式方面都有巨大的投入。自从2004年在韩国首尔成立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截止到2010年12月，中国已在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322个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sup>3</sup>以推广汉语为媒介和平台，孔子学院很好的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文化，经过近6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共外交的标志品牌。而以此引发的汉语热，更是衍生出了“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和在世界各国开展的“汉语年”、“中国年”等双边交流活动，其中“汉语桥”节目的开展是从2002年开始的，时至今日，已举办了9届比赛，吸引了来自50余个国家的数万名选手的参与，在世界各国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也成为了各国青年人了解中国的一条捷径。另外，“奥运模式”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种非常可行，并且成效甚丰的公共外交模式。美国、日本和韩国都曾以奥运会作为吸引世界目光，提升国家形象的绝佳机会，事实也证明奥运会的举办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中国历经两次申奥，终于获得了举办第29届奥运会的机会，国人为之欢呼雀跃，同时也借此机会做了一次覆盖面广、影响深远的公共外交。随后在2010年举办的世博会和亚运会也都是延续了“奥运模式”的理念。三大盛会的举办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面貌——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座中国最大的一线城市相继亮相，让世界了解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生机盎然的中国；通过举办三大盛会，中华民族也经受了一系列重大考验，变得更加成熟、自信和团结。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公共外交平台则是媒体和网络。继中国中央电视台开播（简称：央视）英语频道之后，央视又逐步开播了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频道，基本覆盖了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6大语言；新华网也拥有了7种不同语言的版本；2009年底，宣传“中国制造”的广告片在美国CNN等主流媒体上播放，随后在2010年，这则宣传



片又在英国BBC上播放，受到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可见中国的公共外交形式开始变得愈发的多样化，也更容易被其他国家的普通民众所接触和接受，这不可不谓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大进步。

然而，在看到成果的同时，一些相关的弊端，或者说是挑战也慢慢浮现了出来。首先在三大盛会之后，许多来到中国旅游、参观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大为改变，笔者在与许多到中国来看奥运会和世博会的外国游客的交流中，也发现他们大多认为所见到的中国和他们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要更加现代化、更加多元化，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公共外交的“奥运模式”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更应发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当外国人到了中国才能对中国的印象发生“改观”，如果要让全球50亿人都到中国来游览才能让他们认识中国，那么这将是一个多么浩大甚至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这反映出中国公共外交的手段还太过单一，成效还不够显著，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此外，我们应该看到在公共外交的另一重要任务——应急，中国在这方面还有所欠缺，许多重要事件发生之后，往往是外媒先发表评论，中国媒体或者官方予以应对和反驳，使得中国经常在重大事件的处理方面处于被动并难以获得有利的发言权。再者，目标和效果有一定的差距，尽管之前提到，新华网有了7种语言的版本，但是据在西班牙语频道工作的有关人士透露，<sup>4</sup>他们的网站点击量很少，而且关注度最高的一般也是娱乐板块的消息。因此，在宣传的力度和方法上还是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最后，中国普通民众的公共外交意识还比较薄弱。通过笔者的调查，许多网民都认为，公共外交这个领域离自己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且与其花大力气做好公共外交这种“面子工程”，还不如大力发展经济，中国有朝一日强大了，世界自然会对中国有所改观。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只是埋头干活，不打开门让外界了解自己，那么中国与外界

3 《孔子学院开辟传播中华文化新丝路》，<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1012/t20101222116588.html>.

4 《公共外交，中国准备好了吗？》，<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823?page=1>.

的误会和不信任只会增加，等到中国真的强大了，也许热闹起来的不是中国文化，而是无尽的“中国威胁论”云云。

### 中日民间外交的简要回顾

综上，中国的公共外交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还有比较长的路需要走。为了在发展中少走弯路，我们应该多从其他国家和自己的外交历史中寻找合适的经验，用来推动自身的成长。在中国的外交史上，中日在1945年到1972年这一段时间内开展的“民间外交”被传为一段佳话，它不仅促进了两国民间贸易的巨大增长，带动了中日两国文化、艺术、学术方面的交流，更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种特殊的外交形式在中日关系史上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是“民间外交”，但是在背后，难免都有着中日两国政府的支持和默许，因此这样的“民间外交”与当今所热议的“公共外交”实有许多相同之处。回顾这段外交史，也就是在总结和借鉴中日两国外交家们和两国普通人民的经验和智慧，相信对当下的公共外交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大部分学者把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中日民间外交分为三个时期，即50年代的酝酿和发展时期，60年代的半官半民时期，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的官民并举时期。中日民间交往是从经济贸易交流开始的。早在1949年5、6月间，日本经济、贸易界先后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日中贸易会3个旨在促进日中经济贸易往来的民间组织。195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部署下，中国在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的代表团终于促成了战后第一批日本客人对新中国的访问。通过这次访问双方不但签署了战后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而且周恩来总理还在接见日本客人时，向他们推荐了1950年中国拍摄的电影《白毛女》，这部电影在三年后又被日本人改编成芭蕾舞剧，使这次访问成为了战后中日经贸、文化交流的开端。<sup>5</sup>此后，中日双方又签订了两个民间贸易协定，根据第三次贸易协定的规定，中日商品展览会分别在对方国家相继举行。在经贸发展的大背景下，两国人员往来也逐渐频繁，在周恩来接见过的日本友人中，有政府现任首相、卸任首相、国会议员等政治

家，有经济界人士、文化界人士、旧军人、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学者，也有普通工人、农民。日本方面：日本前首相片山哲、石桥湛山、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长达14年之久的松本治一郎、LT贸易备忘录的铺路者松村谦三、热衷于中日经济往来的高碕达之助、松村的接班人古井喜实、曾任社会党总书记的浅沼稻次郎、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公明党的竹入义胜、全日空社长冈崎嘉平太、“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体育明星松崎君代等；中国方面：郭沫若、廖承志、张香山、赵安博、王晓云、肖向前、孙平化等。在文化方面，除了之前提到的对于电影《白毛女》的改编，两国交流还包括：1955年10月，日本传统戏剧歌舞伎首次来华演出，作为回访，1956年5月27日，在世界艺坛上享有盛誉的我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率领中国京剧代表团去日本进行访问演出。两次访问都在对象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以周恩来总理为主的中方关怀、推动下，中日两国民间团体还陆续签署了渔业、侨民、文化、科学、工会等许多协议，交往日益增多，外交上趣闻轶事如“兰花外交”和“围棋外交”也都为人们津津乐道。<sup>6</sup>然而，中日民间外交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1957年2月，日本岸信介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敌视中国的政策和行动，致使刚刚开展起来的中日民间交流一再受到限制和破坏，作为回应，中方也宣布中断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切经济文化往来；几年后，佐藤政府上台，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并在1969年11月发表的日美共同声明中，宣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凸显其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此外，他还主张承担旨在阻挠中日贸易的《吉田书简》的所谓道义责任，这一切行为都给中日民间外交蒙上了阴影。但是，终究瑕不掩瑜，中日两国20多年的民间外交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正是有了之前频繁的交往和深入的了解，使得两国关系正常化既符合形势，也符合民意，这是名符其实的水到渠成。

由此可见，中日民间外交的经验在于四点：“民间为先、以民促官”这是民间外交这段历史的主线；经贸关系是基础，先经后政的顺序使得中日两国关系能有条不紊的发展；官方的默许和支持，如果没有中日两国官方层面的支持，那么民间也不会有顺畅的交流；最后，

5 《周恩来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宝贵启示》，[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0910/t20091009\\_32384.html](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0910/t20091009_32384.html)。

6 石善涛：《“兰花外交”与“围棋外交”——中日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两则趣闻》，载《党史文汇》2009年第4期。

民间外交也有其脆弱性，由于是非官方性质的，因此这种外交形式很容易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的影响。

### 可供借鉴的经验

虽然中日民间外交和当今的公共外交所处的时代，所针对的对象和所面临的目标都不尽相同，但从“民间外交”的实践和经验中不难看出对于公共外交有指导和现实意义的宝贵借鉴，大致可分为三点。

第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由于中国的公共外交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走不出传统“外宣”的圈子，而且经常被国外媒体贴上“政府”、“官方”的标签。因此，在公共外交这方面，政府要扮演的角色更应该是一个隐形的推手，大力地发展民间团体和非官方的媒体以及网络，才能让其他国家的民众，至少是媒体和民间组织更容易接受。在中国，民间团体，即便是涉及到非传统安全或者非政治领域方面的，比如：环保、妇女儿童权益、传统文化，都呈现出数量较少、影响较小的现状。很多时候其现实是，一个国家与其以官方的姿态去回应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好奇、质疑甚至是“发难”，其效果远远不如以国内相应的民间团体去回应的效果和有效。只要是符合国家法律和规范的民间团体，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政府的鼓励、支持，民间团体自身也应该将自己的利益更多的与国家、国民的利益融合，真正起到为百姓发声、替百姓着想，同时在宣传和发展的形式上也要寻求多样化，应多与国际组织沟通、接轨，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宣传自己的理念和诉求。这不仅加强国内的监管和提高国民的各方面意识，更能在公共外交舞台上展示中国开放、自信的姿态并成为应对危机的极佳媒介。也许在民间团体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对它们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和磨合，但是其未来的效果必定是更有利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的。

第二，“经济是基础，更是保障，文化才是核心”。以前在民间外交时期，我们强调经济是基础，应该以经促政，然而在当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已与世界各个国家有了非常深入的经济联系，我们在重视经济的基础作用时，更应该将其视作公共外交的保障，正是因为有了深入的经济联系，这样的纽带作用才能更好地为我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去进行公共外交，去实践各种具有创新性的方式，甚至可以说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慢慢地、步步为营地找到最佳的公共外交方式和道

路，不需要急于求成。这需要我们一方面稳住根基——切实加强“中国制造”的质量保证，提高中国的信誉和形象；另一方面“借基发挥”——以具有创新性而又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宣传中国的文化，加强活动和宣传的互动性，突出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如：“仁爱”、“和谐”等等以加深受众的印象，把中国文化和宣传形式与时代元素相结合，借助海外华人组织，如：商会、同学会、华人社区团体来进行更加普遍、深入人心的宣传。

第三，使公共外交手段多样化，从而减少和规避国际形势和国内因素的干扰。在中日“民间外交”的实践中，双方经常受到国内政策和国际大环境的干扰和打击，致使“民间外交”不得不停停走走，很多学者称，如果减少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的干扰，中日建交可能在60年代，而不是70年代了。因此，在当下，公共外交应该被赋予更大的灵活性，从而能规避国内因素、国际环境和突发事件的干扰。我们生活在整体和平的新时代，因此，在进行公共外交的内容中应该首先减少意识形态的因素，这样不仅更容易被接受，也会少一些让其他国家可抓住的话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的大片、麦当劳和星巴克遍及全世界，尽管美国时常在外交和国家层面上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但是人们仍然深受这些美国“文化触角”的影响，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应该从公共外交的手段入手，使其多样化，不仅从官方媒体，大型活动出发，同时更应该注意到细微之处，将中国的文化化身为实在之物推广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当中，比如：借助电影这个市场，用一种其他国家民众更容易接受的语言和方式去宣传中国，让他们在了解中国功夫和朴实的劳动人民这些中国文化典型代表的同时，也能看到中国的新面貌和中国人的变化。我们还可以借助饮食文化，将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融入到快餐之中，与当今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接轨，让更多的中产阶级、老百姓亲身接触到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国内许多中国快餐连锁店已经办得很有成就，在中国老百姓心里也有着良好的口碑，因此，我们大可尝试将他们推向世界，想必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网络这个大蛋糕中，中国外交也应有自己的位置，网络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已经是不言而喻，它不再单单属于年轻人、精英分子，现在许多中老年人也已经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网民。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网民最多的国家，因此，发动网络运营商和广大的网民在网络上宣传自己、宣传中国，将中国文化嵌入到网络游戏、自拍视频、社交网络当中，想必这

种平民与平民的对话能达到比“国家级”宣传片更好的效果。最后，海外的“草根”华人组织也是中国公共外交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比如之前提到的，华人商会、学生会、甚至是华人社区的民间组织，他们多年生活在海外，相信比许多国内民众更加了解所在国的风土人情，如果能够发动他们，以国内民间组织的名义与他们建立联系，借助他们宣传中国的文化，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举措。

### 公共外交任重道远

今时今日，中国民众与各国民众已拥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每年出境人数为4600万，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有2400万，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公民离“世界公民”的身份已不远了；中国企业开始到世界各地投资设

厂，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中国自身崛起需要更加和谐的国际环境，这一切不仅给了我们展开公共外交的广泛可能性和机遇，同时也给公共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脚步，其国家利益有必要以公共外交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国家形象并增加自己的国际话语权。

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中国的公共外交不仅要丰富内容和形式，更要提高国民的意识，它既是一种责任感，也是爱国情怀的表现。我们要有“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的基本功，才能达到高水平的公共外交，更多的参考和借鉴国内外公共外交发展的经验，对于自身的发展必有益处，也希望本文能给予相关研究和决策一点不成熟的启示。

### 参考文献：

1. 公共外交的定义，<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919200.htm>.
2. 《公共外交通讯》创刊号。
3. 《孔子学院开辟传播中华文化新丝路》，[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1012/t20101222\\_116588.html](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1012/t20101222_116588.html).
4. 《公共外交，中国准备好了吗？》，<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823?page=1>.
5. 《周恩来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宝贵启示》，[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0910/t20091009\\_32384.html](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0910/t20091009_32384.html).
6. 石善涛：《“兰花外交”与“围棋外交”——中日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两则趣闻》，载《党史文汇》2009年第4期。
7. 《北京奥运中的公共外交浅析》，<http://www.ggykf.com/a/shehui/2009/1215/124.html>.
8. 石善涛：《邦交正常化前的中日民间外交研究述评》，[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0909/t20090906\\_30002\\_1.html](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0909/t20090906_30002_1.html).
9. 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 《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在民间》，[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1003/t20100308\\_44443.html](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1003/t20100308_44443.html).
11. 《从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0910/t20091010\\_32451.html](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0910/t20091010_32451.html).
12. 《中日关系要从民间友好做起》，[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5-06/25/content\\_3133290.htm](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5-06/25/content_3133290.htm).
13. 傅莹：《为什么公共外交那么重要》，<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0-09/1098647.html>.
14. 王玉贵：《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0909/t20090916\\_31475.html](http://www.hprc.org.cn/gsyj/wjs/mjdw/200909/t20090916_31475.html).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亚洲几国 货币政策的比较研究<sup>1</sup>

任康钰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摘要】** 本文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几个亚洲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的目标国是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在对这几个国家危机前的宏观经济状况进行了基本了解之后，具体观察了他们在危机发生后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如在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方面的操作，以及一些受货币政策影响的指标的变化状况，如货币总量、信贷总量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他们的货币政策的比较研究，做出了对货币政策的一些判断和对中国的借鉴。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货币政策 亚洲国家

## 一、引言

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面广，影响程度大，很多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它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Romer,2009）。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亚洲国家和地区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使尽浑身解数。无论是调整到几乎为零的利率，还是规模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都试图为市场提供信心和支持，鼓励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等行为，以期减少经济衰退的程度和缩短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其中，货币政策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对于2009年后期以来经济能够较为普遍地见底回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Mishkin,2009）。毕竟，央行是整个市场的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作为危机源起国的美国，在次贷危机开始不久的2007年8月，就开始积极地实施货币政策，不断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将其从5.25%一直降到2008年12月的0-0.25%。与此同时，美联储还通过各种方式为一些机构注入流动性。那么，在此次危机过程中，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在危机中选择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呢？这些货币政策在各地区的作用机制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中国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样有益的经验呢？本文就试图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探索和研究。

首先对要研究的目标国进行选择。毕竟，亚洲是一个涵盖众多国家的区域，对所有这些国家都进行观察和研究既没有必要、也缺乏可行性。在确定了所要研究的目标国家之后，我们还要了解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状况；然后，对危机发生以来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状况进行观察，在此基础上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比较，并就中国能够获得的启示和借鉴进行讨论。

## 二、目标国的选择及其经济状况观察

亚洲的国家（地区）众多，因此必须有所选择，这样才会使研究更有效率并得到较有意义的结果。中国作为比较研究的核心，自然是要在观察范围之内。除了中国，本研究还选择了日本、韩国和印度等三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理由如下。

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sup>2</sup>也是亚洲发展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另外，日本自1990年代以来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低迷。因此，日本如何在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下采取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政策效果怎样，当然值得我们研究。

韩国是东亚地区新兴经济体（emerging market）的

<sup>1</sup>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课题研究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sup>2</sup> 就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根据最新发布的2010年第2季度统计数字，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代表,<sup>3</sup>过去一直有较好的经济表现。然而,在十年前的东亚金融危机(1997-1998 East Asia Financial Crisis)中,韩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此,观察韩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货币政策,既可以直接从中有所借鉴,也可以通过对比其两次金融危机的状况获得一些启发。

作为一个同中国类似的人口大国,也是南亚地区的最大经济体,印度往往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亚洲国家。而且,近年来关于中国和印度的各种比较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印度受到了什么影响,采取了哪些货币政策,也是值得我们进行观察和研究的。

要了解这些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的货币政策,还需要先对这些国家在危机前的经济状况进行观察。此次金融危机起源于2007年初在美国开始显露端倪的次贷危机,但直到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正式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才促使次贷危机升级为全球性金融风暴(吴晓灵,2009)。因此,如果简单地进行时间上的划分,2008年之前(包含2008年)的几年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危机前”<sup>4</sup>时间段。那么,这一段时间里这几个国家在主要的经济指标上有什么表现呢?

先来看产出增长水平。

表1: 几国的产出年增长率

年份\国家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2006	11.6%	2.4%	5.2%	9.8%
2007	11.9%	2.1%	5.1%	9.3%
2008	9.6%	-1.2%	2.3%	6.4%

数据来源: 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数据来自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8; October 2009; 韩国的数据来自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2010, 并进行了四舍五入的处理。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们所研究的几个国家在危机前两年都有不错的经济表现,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增长率都相当高。尽管日本的增长只有2%多,但相对之前的经

济低迷状况也是相当不错了。不过,由于危机的冲击,2008年几个国家的产出增长率都减少了,日本甚至变成负增长。

危机之前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也是货币政策中特别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几个国家的价格指数。

表2: 几国的CPI年增长率

年份\国家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2006	1.46%	0.24%	2.2%	5.8%
2007	4.75%	0.06%	2.54%	6.37%
2008	5.86%	1.38%	4.7%	8.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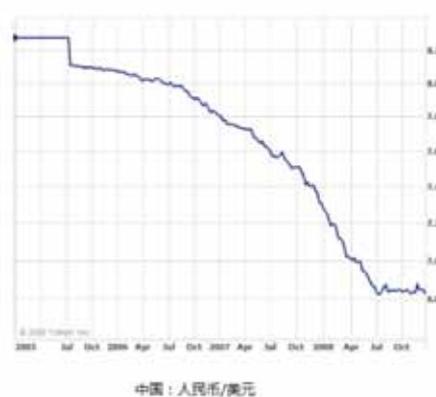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2010.

上表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和印度在2007年都已经有一定的物价上涨,这一趋势甚至持续到危机已经开始的2008年。除了日本,几个国家的通胀率在2008年都超过了一般公认的3%水平。

还有一个指标对于我们观察货币政策十分重要,就是汇率。这里,我们就观察一下这段时期里<sup>5</sup>这几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的变化状况。

图1: 几个国家货币的汇率变动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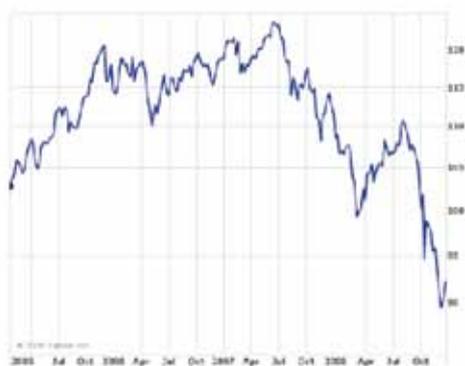
(2005年初—2008年底)



<sup>3</sup> 现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中,已经将韩国列入了工业化国家之中。

<sup>4</sup> 这里的“危机前”既有危机发生之前的意思,又有危机发生以后较早时期的意思。因为要观察的经济指标都是年度数据,所以不能将这两者进行严格的区分。

<sup>5</sup> 中国在2005年7月进行了一次汇率政策改革,所以这里我们把观察的时间提前到2005年。



日本：日元/美元



韩国：韩元/美元



印度：卢比/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网站[www.123cha.com/hl](http://www.123cha.com/hl) 的数据整理而成。

这里的汇率都是以美元作为基准货币的。从上面几幅图可以看到，这几个国家的货币的美元汇率在观察期

走势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经济中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或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主要表现为美国不断积累的经常账户赤字，和东亚、中东等地区不断积累的经常账户盈余。<sup>6</sup>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之前这几种货币都呈现出对美元基本升值的态势，尤其显著的是中国和印度。人民币在2005年7月进行了汇率改革之后对美元持续地单边升值；一直到2008年7月在危机发生的背景下才停止。更多的有关汇率的分析我们会在后面面对货币政策的探讨中继续。

以上我们对要研究的几个国家的产出、通货膨胀、汇率等指标在危机发生之前和危机发生早期的状况进行了观察，这为我们研究他们在危机中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基本的背景。

### 三、危机以来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

通过上一部分的观察可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几个目标国的宏观经济状况都比较好，面临的更大压力反而来自通货膨胀。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美国为主的外部世界的经济、金融环境迅速发生变化，使亚洲这几个国家必须做出政策上的反应，以减少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冲击。这一点对于非常依赖出口的亚洲国家尤为重要。那么，这些国家都是如何在货币政策上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呢？

#### （一）中国

2007年相当长时期里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的危险。一直到2008年中期，为了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基调是适度从紧。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下，2007年里人行先后6次上调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基准利率，10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还有一次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进入2008年上半年，在通货膨胀压力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人行继续5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共3个百分点到17.5%的高位。<sup>7</sup>然而，随着2008年9月次贷危机终于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央行在国内通货

<sup>6</sup> 有关全球不平衡与国际金融危机的讨论非常多，有一些认为前者就是后者发生的原因。笔者也有文章专门对此进行讨论。不过在本文中，我们并不特别就这一点深入讨论。

<sup>7</sup> 五次上调分别是在2008年1月16日、3月18日、4月16日、5月12日和6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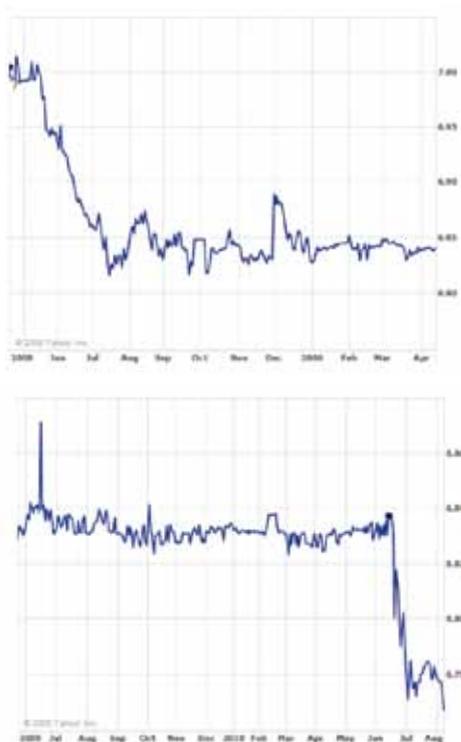
膨胀压力有所缓解的情况下，在9月以后连续4次下调准备金率、<sup>8</sup>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sup>9</sup>货币政策的基调也自然转变为适度宽松，并在2009年继续维持低位的基准利率。一直到2010年初，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之后，人行小幅上调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共1.5%。

除了对利率和准备金率的调整之外，中国人民银行还在汇率、公开市场操作、信贷等方面做出了针对金融危机的应对。通过对几个指标的观察可以更直观地了解这些货币政策的操作和效果。

图1中给出了人民币在2005年到2008年底的汇率状况（与美元），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之后到2010年中的汇率走势。<sup>10</sup>

图2：人民币的美元汇率走势（RMB/\$）

（2008年初—2010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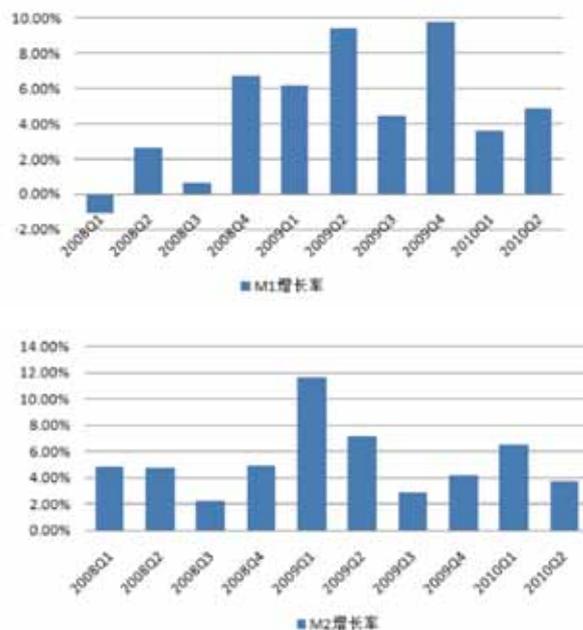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根据网站www.123cha.com/hl 的数据整理而成。

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之前的7月，为了应对次贷危机蔓延深化的挑战，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就被收紧，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被维持在6.82—6.85元人民币/美元的区间窄幅波动，一直到2010年6月19日才重新开始新一轮对美元的升值进程。

货币供应量是反应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很多国家在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盯住的中间目标。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将货币政策的基调转为适度宽松，就直接反应在货币供应上。

图3：中国货币供应状况（2008年初—2010年中）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www.pbc.gov.cn 上的统计数据整理计算。M1和M2的季度增长率的计算方法为： $(\text{本季度末数值} / \text{上一个季度末数值} - 1) * 100\%$ 。

从上图可以看出，直接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影响的M1指标在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有显著的增加，季度增长幅度从之前的低于1%一跃到6%以上，除了2009年

8 四次下调分别是在2008年9月25日、10月15日、12月5日和12月25日。其中，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累计下调2个百分点，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累计下调4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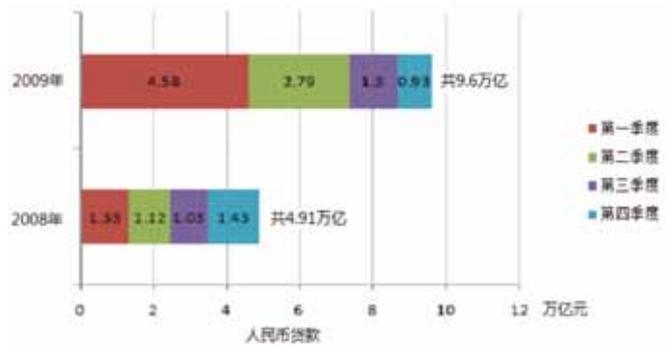
9 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4.14%下调至2.25%，累计下调1.89个百分点；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7.47%下调至5.31%，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

10 为了有一定的连贯性，这里从2008年初开始。

第三季度有所下降之外，直到2010年才回到4%左右，不过仍然高于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2009年的M1增幅累计达33.2%，达到了1993年以来的最高。相应地，广义货币指标M2从2008年底到2009年底也是显著增加，幅度达28.4%，增速比上一年高出10.6个百分点，也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

中国央行在危机中的另一个货币政策举措是指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总量，以此来支持和刺激经济活动，从而尽量降低实体经济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中国金融机构在危机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都显著增加。

图4：中国的信贷状况（2008年、2009年）



数据来源：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8年第四季度，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

从2008年第四个季度开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人民币贷款规模就开始增大；到了2009年第一季度，迅速达到了增发贷款的顶峰，共发放4.58万亿，几乎是2008年全年的总额。随后各季度贷款不断减少。2009年全年的信贷总额达9.6万亿元，成为到近年来的最高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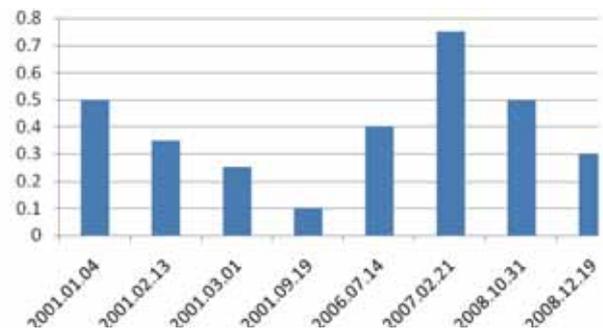
以上我们从利率、汇率、货币供应、信贷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在危机中的货币政策进行了观察。接下来，我们再观察一下另外几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状况。

## （二）日本

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作为日本的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个是对经济活动和价格的短期展望；一个是对风险的长期展望，包括资产价格泡沫。它通过执行货币政策来保持物价的稳定

（Price Stability），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到2008年中期，日本银行面对的是对国内需求进一步疲软的预期和较为温和的通胀压力，所以保持着一个适应性货币政策（accommodative monetary policy）的立场，并将利率水平维持在当时较低的水平上。因为日本过去近十年都是在和通货紧缩（deflation）做斗争，一直执行着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政策。不过，随着金融危机的升级，日本银行在2008年10月和12月将已经很低的基础贴现率和基础贷款利率（The Basic Discount Rate and Basic Loan Rate）又进行了两次下调，达到0.3%的低位。

图5：日本银行近年来基础贴现率和基础贷款利率变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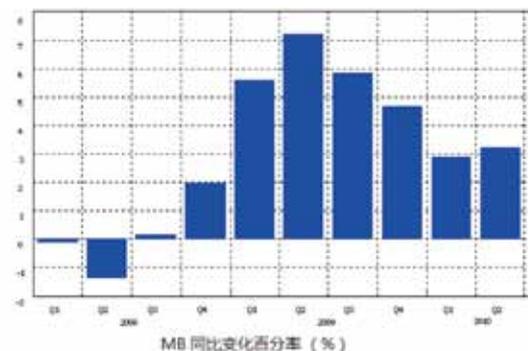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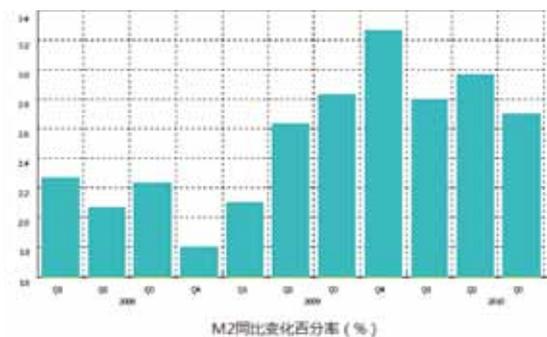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来自日本银行官方网站数据<http://www.boj.or.jp/en/theme/research/stat/boj/discount/index.htm>。

日本银行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就执行着非常低的准备金率（大概1%左右），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再调整过该指标，金融危机发生后也没有对其进行调整。

日本银行还利用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来影响货币供应量，以此来实现货币政策的一些意图。我们可以通过下图来观察日本货币供应的变化状况。

图6：日本货币供应状况（2008年初-2010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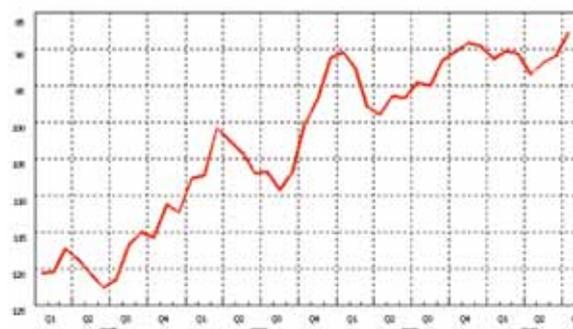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来自日本银行官方网站数据[http://www.stat-search.boj.or.jp/ssi/cgi-bin/famecgi2?cgi=\\$graphwnd\\_en](http://www.stat-search.boj.or.jp/ssi/cgi-bin/famecgi2?cgi=$graphwnd_en).

可以看出，日本银行在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增加了对基础货币的投放幅度，从而支持货币供应（M2）有较高的增长。

不同于中国央行，日本银行并不直接引导金融机构的信贷活动，只是通过基础利率等指标进行调节。所以，我们没有观察到贷款指标在金融危机中的显著增加，这里就不列出了。

再来看日元汇率。日本在1998年通过《外汇和外贸法》，基本解除了关于外汇业务的各种限制，让市场决定汇率变动。不过，日本银行在必要时通过外汇基金特别账户（the Foreign Exchange Fund Special Account, FEFSAs）对汇率进行干预从而稳定市场。从图1中的第二副图可以看出，日元在2007年中以后大体保持了对美元的升值趋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日本银行没有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sup>11</sup>

图7：日元的美元汇率走势<sup>12</sup>（¥/\$）（2007年—2010年）



数据来源：[http://www.stat-search.boj.or.jp/ssi/cgi-bin/famecgi2?cgi=\\$graphwnd\\_en](http://www.stat-search.boj.or.jp/ssi/cgi-bin/famecgi2?cgi=$graphwnd_en).

从上图可以看出，除了在2008年第2季度和2009年第1季度有所贬值之外，日元基本上保持了持续的对美元的升值。除了在利率等方面的操作外，日本银行还有其他的一些应对金融危机的操作，如设置“补充存款便利（the complementary deposit facility）”、鼓励公司融资等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

### （三）韩国

经历过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打击的韩国，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有什么货币政策操作呢？随着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在面临国内经济和外汇市场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形下，韩国银行（the Bank of Korea，韩国中央银行）积极地通过多种政策操作进行应对，包括调整基础利率、提供信贷支持、稳定外汇市场等诸多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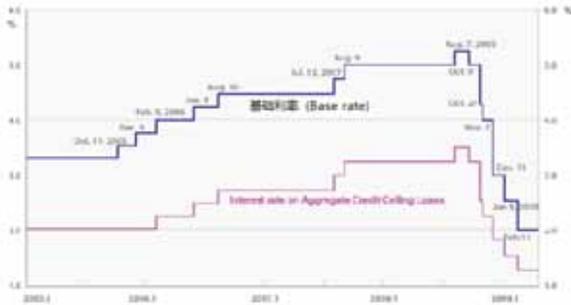
韩国银行从1999年5月开始每月公布基础利率（Base Rate），以此作为与金融机构进行资金交易的参考利率，也是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在危机发生之前，该利率位于较高的5%水平上，在2008年8月甚至还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被小幅上调到5.25%。然而，从2008年10月开始，到2009年2月，短时期里经过6次向下调整，基础利率最终达到2%的水平，这也是1999年以来最低的。一直

<sup>11</sup> 见日本财务省网站关于外汇干预操作（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Operations）发布的报告，<http://www.mof.go.jp/english/e1c021.htm>。

<sup>12</sup> 特别注意，这里的纵轴是转置的，所以越往上意味着日元币值越高。

到2010年7月，韩国银行才小幅上调该利率到2.25%。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指标“总信贷上限贷款利率（interest rate on Aggregate Credit Ceiling Loans）”也从3.5%调低到1.25%。

图8：韩国的基础利率和总信贷上限贷款利率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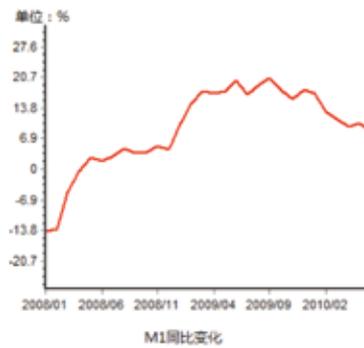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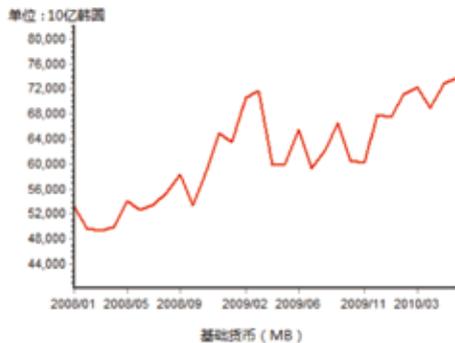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韩国银行官方网站<http://eng.bok.or.kr/>。

上面提到的“总信贷上限贷款”，是中央银行通过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特别支持银行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政策工具。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银行不仅降低了这一贷款的利率，还同时大规模地提高了这一贷款的规模：2008年11月，该额度从6.5万亿韩元增加到9.0万亿；2009年3月又进一步增加到10万亿韩元。韩国银行在准备金上的操作不是降低准备金率，而是在2008年12月一次性付给商业银行总计5002亿韩元的利息，帮助银行扩大信贷供应空间。

韩国银行还通过扩大公开市场业务中的产品类型等方式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这些可以反映在有关的货币总量指标上。

图9：韩国的基础货币与M1指标状况（2008—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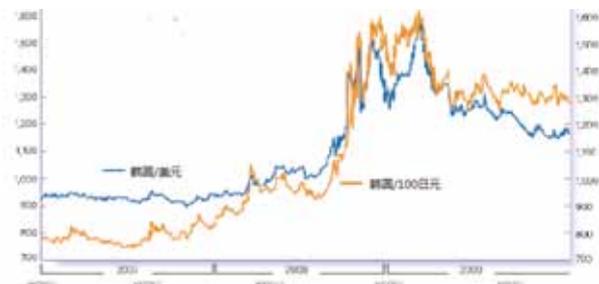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韩国中央银行数据处理系统网站[http://ecos.bok.or.kr/EIndex\\_en.jsp](http://ecos.bok.or.kr/EIndex_en.jsp)。

通过以上各种努力及其他的一些操作，韩国银行在金融动荡中尽量保证了市场上的流动性，保证了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的信贷供应能力，从而也防止实体经济过多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

在外汇市场上，由于在韩国的外国投资资金外流和贸易逆差，2008年初韩元就开始了美元和日元的贬值过程；2008年9月中旬之后贬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进一步加速，11月24日达到了自1998年3月以来的最高值1513韩元/美元。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银行也开始积极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2008年10月30日，韩国银行和美联储签订了规模达300亿美元的韩元/美元互换协议；12月12日，分别和中国人民银行、日本银行签订了规模为1800亿人民币的韩元/人民币、相当于200亿美元的日元的韩元/日元互换协议。

图10：韩元与日元、美元的汇率走势（左：韩元/美元；右：韩元/100日元）



数据来源：The Bank of Korea, Annual Report 2009, P15.

韩国银行利用来自互换协议的基金和外汇储备加大对金融机构投放外汇流动性的力度。再加上逐渐改善的经常账户差额，韩元的贬值暂时停止。到2009年初，出于对安全资产的需求，美元又走强直到3月2日达到新的高点1570.3韩元/美元。之后在韩国银行稳定市场的努力下和韩国不断好转的经常账户余额影响下，韩元基本保持了稳步升值的态势。需要强调的是，在稳定外汇市场的同时，韩国政府还在继续推进着其外汇交易自由化的进程。

#### （四）印度

近年来关于印度与中国的比较很多，那么印度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有什么货币政策应对呢？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简称RBI）是印度的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在2008年9月之前，印度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通货膨胀压力，央行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之后，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央行迅速转向适应性货币政策立场（accommodative monetary policy stance）以及较为宽松的立场，以向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印度央行的政策利率包括三个：银行利率（Bank Rate）、回购利率（Repo Rate）和逆回购利率（Reverse Repo Rate）。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央行从2008年10月起就将回购利率累计下调了4.25个百分点，将逆回购利率累计下调了2.75个百分点。不过，银行利率一直维持在6%的水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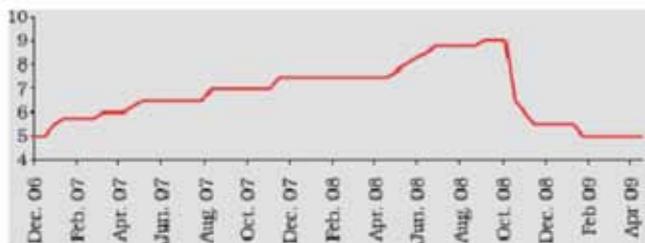
表3：印度央行的回购利率和逆回购利率变化

日期	2008年					2009年		
	7.19	7.30	10.11	11.3	12.8	1.5	3.5	4.21
回购利率	8.5	9.0	8.0	7.5	6.5	5.5	5.0	4.75
逆回购利率	6.0	6.0	6.0	6.0	5.0	4.0	3.5	3.25

数据来源：印度储备银行官方网站<http://rbi.org.in>。

印度央行要求银行按照现金准备比率（Cash Reserve Ratio, CRR）上缴准备金，并根据货币政策的需要调整这一比率。这也是影响市场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在2008年9月之前，印度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不断提高该比率；2008年10月开始随着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央行迅速下调了该比率，从9%降到了5%。

图11：印度的现金准备比率（%）



数据来源：印度储备银行，2008—2009年年报，P85。

不过，与上面几个国家情况不同的是，印度的几个货币总量指标并没有在危机中表现出显著的增加，甚至增长率都有显著下降。

表4：印度几个货币总量指标的变化率（%）

项目	储备货币 (Reserve Money)	狭义货币M1 (Narrow Money)	广义货币M3 (Broad Money)
时间			
2007—2008 <sup>@</sup>	31.0	19.4	21.4
2008—2009	6.4	8.4	18.6

数据来源：印度储备银行，2008—2009年年报，P399。

<sup>@</sup>：印度央行的统计区间是每年的7月1日开始到次年的6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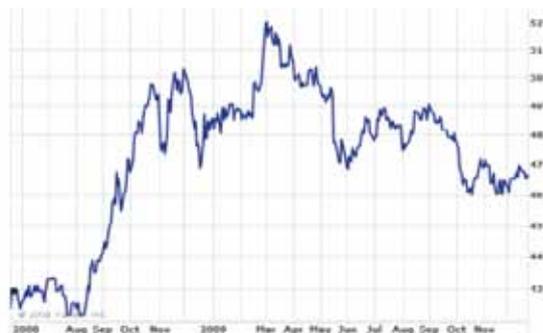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几个货币指标的显著变化，这主要与印度在危机之前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有关。

在外汇市场方面，其自由化的进程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而且，印度央行还通过进一步放松在外国直接投资等项目下的资本流动来推进其资本项目下

更多的自由兑换。同时，为了减少外汇市场上的风险，央行通过很多具体的操作来增加市场上的外汇(主要是美元)。

图12: 印度卢比的美元汇率走势(卢比/美元):

2008年中—2009年



数据来源: 根据网站www.123cha.com/hl 的数据整理而成。

如上图所示, 2008年后期在危机的冲击下印度货币也经历了一轮较大幅度地贬值; 在2009年初也有一轮较小幅度的贬值。印度卢比的汇率在变化时间上与韩国货币有一定的相似性, 表现出全球金融危机较为广泛的冲击。2009年3月以后, 卢比呈现出对美元的升值趋势。

#### 四、对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分析和比较

以上我们从利率调整、货币总量变化、信贷及外汇市场等多个方面观察了几个国家在2008年前后的货币政策状况。一般来讲, 货币政策的职责在于稳定价格和金融市场, 从而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那么, 在2008年中后期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所带来的金融市场信贷环境紧张、需求紧缩等冲击下, 在我们所观察到的货币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下, 这几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如何呢?

表5: 几国的产出和价格指标

年份\国家	产出年增长率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2007	11.9%	2.1%	5.1%	9.3%
2008	9.6%	-1.2%	2.3%	6.4%
2009	9.1%	-5.2%	0.2%	5.7%
2010	10.5%	2.4%	4.5%	9.4%

年份\国家	CPI年增长率			
	中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2007	4.75%	0.06%	2.54%	6.37%
2008	5.86%	1.38%	4.67%	8.35%
2009	-0.69%	-1.38%	2.76%	10.88%
2010	3.12%	-1.41%	2.90%	13.16%

数据来源: 1) 产出: 来自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8; October 2009; July 2010; 2010年的数据是预测值。

2) CPI: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2010;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库数据; 2010年度的数据是估测值。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 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 几个国家的产出增长都在2008年、2009年逐年下降。但是, 从2010年的预测值来看, 各国经济都应该会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这其中, 应该有来自各国积极采取的货币政策的贡献。接下来, 我们就对这几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一些分析和比较。

#### (一) 货币政策的快速反应

正如Cecchetti (2008) 所说, 中央银行往往是在危机中能够做出足够迅速而强力的反应的唯一官方实体。尽管他研究的是美联储, 但从上面可以看出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的观察对象中。随着2008年9月15日美国次贷危机升级为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几个国家都迅速做出了货币政策上的反应。

表6: 几国针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反应

国家	首先采取货币政策的时间	政策内容
中国	2008年9月25日	下调准备金率和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
日本	2008年10月31日	下调基础贴现率 (BDR) 和基础贷款利率 (BLR)
韩国	2008年10月9日	下调基础利率 (BR)
印度	2008年10月11日	下调回购利率 (RR) 和现金准备比率 (CRR)

数据来源: 根据前面图表中的信息整理而得。

因此，利用货币政策积极地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各国经济政策当局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货币政策工具中，一些比率指标又往往是最容易被迅速调整的。一般来讲，中央银行具有对诸如准备金率、基础利率等指标的调节权。所以，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中央银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对未来状况的预测及时、灵活地对这些指标进行调节，以发挥其在经济中的信号和杠杆作用。

### （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和创新使用

除了利率指标，央行还需要充分使用各种政策工具。在我们观察的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几个国家中，为了减少金融危机可能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其央行都综合使用了各种货币政策工具。

根据一般的货币银行理论，基础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贴现贷款和准备金率，然后再有货币总量或者利率这样的中间目标，以帮助中央银行实现最终目标。在发生金融危机这样特别的情形下，为了减少危机的冲击，应该充分使用各种政策工具。而且，还可以根据情形的需要在传统工具基础之上进行创新。例如，中国和印度在危机发生后都降低了对银行的准备金率要求，而韩国则是向商业银行支付了一笔准备金存款的利息，这也能达到增加银行系统流动性的目的。在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除了传统地以国库券作为交易目标外，还可以在非常时期对此进行扩展，从而增大对货币总量的影响力度，如日本和韩国在危机中的做法。

另外，在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还可以积极利用外部资源，例如与别国中央银行的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金融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也是危机的冲击范围如此广泛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可以利用这种联系，在金融危机中通过合作、互助减少冲击。例如上面提到的几个国家，都有在金融危机中进入中央银行之间的流动性互换（Central Banks Liquidity Swap），来达到增加本国市场外汇流动性、稳定外汇市场的目的。<sup>13</sup>

### （三）对本国具体情况和国际经济环境的综合考量

虽然这几个国家都积极地通过货币政策应对危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在采取政策的时间、力度和方式上的差别。这主要源于各国在具体情况上的差别以及各国对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影响的分析。

中国和印度在2007年到2008年中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但从指标上看，印度的通胀压力更大一些。因此，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减少负面冲击，印度在调整利率的范围和幅度上都比中国要小，如印度并没有调整其银行利率（Bank Rate）这一基础利率指标，调整后的回购利率仍然在4.75%的水平。在货币总量的变化上，印度相比其他几个国家的增长率都小。

同时，从这几个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还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各国都十分重视外部经济环境可能给本国带来的冲击。所以，当出现全球金融危机时，一国可能更为担心由此受到的影响，就会很快调整原来的货币政策方向，如中国和印度都改变了之前的较紧的货币政策立场。而全球化下各经济体彼此之间的依赖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的必要性。因此，货币政策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本国价格、金融环境的变化，还需要及时注意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变化。但是，有时对国内情况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权衡可能是比较困难的问题，尤其是当两种情况对货币政策的要求有矛盾时。比如印度在危机后减少了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政策，其2009、2010年的通胀率逐年上升（见表5）。那么，事后来看，到底是当时继续和通胀作战更重要呢？还是减少危机带来的市场收缩更重要呢？这恐怕是货币政策当局需要仔细考量的。第二，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市场提供的资金和信心对各个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都非常重要。因此，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形下，货币政策当局及时的政策反应还提供了重要的信号，对于维持市场信心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随着危机的结束，如何根据本国具体的情况再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是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当局面对的更为严峻的任务。

<sup>13</sup> 这里，韩国和印度通过互换获得外汇流动性支持，而日本和中国主要在互换协议中提供流动性。



#### （四）中国从几个国家货币政策中得到的借鉴

从上面对货币政策和经济状况的观察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是十分及时、全面的，对中国经济能够减少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迅速从危机中复苏都有重要贡献。但是，通过对比，我们仍然能够从别国经验中有所借鉴。从几个国家危机发生前后外汇汇率的变动来看，中国在外汇汇率上的反应非常迅速，甚至在2008年7月就减少了汇率波动的幅度，使汇率一直稳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直到2010年中期。这样做固然减少了人民币的汇率风险，但却无法使汇率作为一个价格指数发挥调节作用。另外，在金融市场信贷方面，在中国央行的指导下，中国的信贷规模扩展非常大。这固然有利于支持市场的投资活动从而支持产出，但这样做有可能影响信贷的质量，埋下不良贷款产生的种子。而一旦这些问题爆发出来，那不啻为又一场危机。因此，在信贷方面，中央银行控制的应该是基础利率这样的指标，具体的信贷行为则应该留给市场去完成。

#### 五、总结

本文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几个亚洲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围绕着中国，我们选取了日本、韩国和印度，他们都在某些方面可能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借鉴。

在对几个国家危机前的宏观经济状况进行了基本了解之后，我们具体观察了他们在危机发生后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如在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方面的操作，以及一些受货币政策影响的指标的变化状况，如货币总量、信贷总量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他们的货币政策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货币政策确实是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后能够做出最为及时反应的经济政策工具，因此，一国需要也应该积极地运用货币政策来应付外部冲击。在具体选择和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一国货币当局不但要综合使用各种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还应该根据环境来进行政策上的创新。而且，各国货币当局也不是彼此孤立的，而应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增强彼此间的联系和合作，以便有更多的资源来保障金融市场

的稳定。当然，在具体选择货币政策的立场和操作时，一国还需要充分考虑本国自身的状况，而不是简单地“随大流”。最后，通过对几个国家货币政策的比较更为重要的意义是，能够从中得到一些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应该在外汇交易、资本账户的市场化改革上，在信贷、利率市场化方面，不断实践和完善。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很多可以进一步扩展和深入的空间。首先，这里我们在众多的亚洲经济体中选择了四个国家进行观察，非常有限。如果能够在未来进行扩展，可能会得到更多有意义的结果。其次，对于货币政策的操作，我们只是观察和讨论了几个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如调整利率、扩大信贷等。在对宏观经济的观察

中，我们也只是简单地选取了产出和价格指数。但实际中，与货币政策相关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国际贸易的变化状况等等。如果能够将更多的操作、经济指标纳入进来，这一比较研究无疑会更为全面。第三，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是应对危机的非常重要的宏观政策手段。如果能够结合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将会使研究更为全面。最后，从研究的时间维度来看，当前的研究仅限于危机发生前后的一两年时间里，非常有限。另外，如果时间拉长，还可以将有关货币政策退出或转向的问题考虑进来，从而使对货币政策的研究和评价更加全面。

## 参考文献：

1. Cecchetti(2008), *Crisis and Responses: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2008*, NBER Working Paper 14134.
2. Frankel, Jeffrey A. (2010), “*Monetary Policy in Emerging Markets: A Survey*”, Working Paper 16125, Jun.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8),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8; October 2009; July 2010.
4. Mishkin, Frederic S. (2009), “*Is Monetary Policy Effective During Financial Crises?*”, Working Paper 14678, Jan.
5. Romer, Christina, (2009)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for Economic Recovery in 2009*,” presented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March 9).
6. 任康钰：《次贷危机以来中央银行的作为——对中美两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观察和分析》，载《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8期。
7. 吴晓灵等：《2008年国际金融十大新闻》，载《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1期。
8. 中国人民银行：载《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8、2009年各期。
9. 日本银行、韩国银行、印度储备银行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 亚洲公立大学法律治理比较研究<sup>1</sup>

姚金菊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摘要】** 公立大学治理关键在于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所有的国立大学依据《国立大学法》作为一种独立法人；新加坡的每所公立大学都有自己的法律，依据《公司法》成为非营利的大学公司；香港每所公立大学都有自身的法令，是香港的公共法定社团，三种不同模式都注重通过法律地位改革扩大公立大学的自主权，外部治理结构上都采取了利益相关者模式，在政府和校方人员之外吸收校友和社会人士参与学校治理过程，且政府以拨款和合同等引导方式代替传统的命令方式；内部治理结构上学术和行政权力分开制衡，在学术事项上尊重教授权力，而在学校经营发展方面则强化了以校长为首的经营权，且有增加院系层级自主权力的趋势。香港和新加坡在强调大学自主的同时继续保障政府对大学的资助义务，日本则有所削弱。我国公立大学法律治理，要肯定公立大学独立法律地位，又要规范其行为，同时要保障政府投入和合法有效监管；引入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通过董事会或校务委员会等方式吸引校外人士参与治理。

**【关键词】** 亚洲 公立大学 法律 治理

根据《泰晤士报》最新公布的2009年全球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中的41所大学集中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亚洲国家仅有九所大学进入前50名，其中日本三所，香港三所，新加坡一所，韩国一所，中国大陆仅有一所跻身其中。

大学制度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何通过大学治理结构的完善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关注重点都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大学，而且往往是这些国家的私立大学，甚至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路上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主张对公立大学进行改革，一是主张我国应加强建设私立大学。然而，在以这些世界一流大学为参照的同时，同处亚洲的公立大学所取得的进步往往被忽视了。根据世界权威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排行榜，位居世界前50名的固然有着西方的欧美名校，但同样有一定数目的亚洲大学，并且令人惊讶的是，几乎这些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学也都是公立大

学。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公立或者私立本身并非决定大学地位的关键。那么，这些同处亚洲却能跻身世界前列的公立大学到底有何奥秘呢？通过对这些公立大学的法律性质及治理结构的比较也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

## 一、日本东京大学

2004年4月起日本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正式开始实施，建立了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制度，这被称作自1886年东京帝国大学成立以来“第一次改变国立大学”设置并可能导致国立大学改革走上改变学校性质道路的重大变革。<sup>2</sup>

东京大学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日本的代表性大学。东京大学的法律地位依据日本《国立大学法人法》取得。根据该法，日本国立大学在2004年建立国立大学法人制度。该法案附日本全国89所国立大学法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课题研究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2 赵永东：《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制度评析》，载《江苏高教》2005年第6期。

人的名称列表, 东京大学赫然在目, 法人名称为“国立大学法人东京大学”。在法律性质上, 东京大学变更为“国立大学法人”, 这一独立的法律地位使得大学在学校办学、运营方面获得了许多超出作为政府下属机构的国立大学所拥有的自主权。

根据《国立大学法人法》, 国立大学运行体制是校长负责, 法人组织“董事会”为学校法人的最高权力机构, “经营协议会”和“教育研究评议会”分别为学校经营事项和教育研究事项的决策机构。

2003年3月18日开始施行的《东京大学宪章》是东京大学的组织、运营的基本原则, 所有与东京大学相关的法令必须按照宪章进行解释及运用。东京大学在其宪章中明确将大学自治作为其基本理念。



东京大学有关组织架构及其职能如下:

1. 大学校长(总长)。根据《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 国立大学校长为国立大学法人的最高权力者, 校长是经营、教育两方面的最高负责人, 所有教职员工都将由校长任命。为打破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藩篱, 更充分地利用社会资源办学, 该法还规定“校长遴选考评会议”等机构的构成人员中必须有校外人士。

《宪章》则规定, 校长负责大学的统筹工作, 考

虑从教育、研究以及经营两方面使组成人员的意见能够达到圆满及综合的统一, 同时实现有效且机动灵活的运营。

2. 经营协议会。根据《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 经营协议会一般由校内委员和校外委员各半数组成。东京大学经营协议会共有委员24人, 其中校内委员有12人, 除了校长和副校长外, 还有教授代表和学部研究机构负责人; 校外委员有12人, 主要来自企业界, 如株式会社东芝董事长、丰田汽车株式会社董事顾问等。此外还有来自公立学校互助会、财团法人日本情报处理开发协会的人员。

3. 教育研究评议会。由校内人员组成, 主要是由校长、副校长和各学部研究机构负责人组成。

4. 董事会(管理理事会)。东京大学引进民间的经营方式, 即引进“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是校内最高决策机构。<sup>3</sup> 校长在对学校的重大事项做出决定之前, 必须经过“管理理事会”的讨论。<sup>4</sup>

5. 大学组成人员的职责及义务。教职工和学生都是大学的组成人员, 他们根据各自的作用和活动领域, 拥有参与学校运营的机会。

6. 大学基本组织的自治和责任义务。大学下设学部、研究科和附设研究所等基本组织, 在大学内部自律运营, 平等拥有参与到大体运营的机会。

总体来看, 东京大学内部管理划分为院校与学部两大层次, 即董事会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人员, 学部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管理人员。

在外部治理结构方面, 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引入了第三者评价制度。由独立于政府和大学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大学的教育研究业绩进行的客观、公正评价。这种评价制度要求及时地向社会、家长公开发表评价结果、财务内容、教育研究等信息, 可以消除大学与社会、家长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使他们对国立大学的教育质量进行定位, 而且, 国立大学通过第三者评价来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有助于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机制。<sup>5</sup>

3 宋石平:《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评析》,载《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11期;王秀亭:《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后治理结构的变化》,载《教育视野》2007年3月号下旬刊。

4 胡建华:《日本大学制度创新年的重要举措——〈国立大学法人〉的出台及其分析》,载《外国教育研究》2004年第10期;田爱丽:《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制度研究及启示——大学、政府及社会关系视角》,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5 宋石平:《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评析》,载《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11期;王秀亭:《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后治理结构的变化》,载《教育视野》2007年3月号下旬刊。



## 二、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大学分为自治大学 (Autonomous Universities) 和私立大学 (Private Universities)。新加坡采取以知识经济为基础、革新为导向的经济策略，决定将公共资助大学转变为研究型大学，转变的第一步就是对大学进行战略性审视，使大学能更好地个性化地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大学竞争中获得佳绩。2004年4月对美国三所大学的治理模式进行考察后，考察组认为主要学习点就是自治成功，需要培育大学利益相关者所有的文化。为此，政府接受了大学自治治理和资助指导委员会 (University Autonomy, Governance and Funding (UAGF) Steering Committee) 的建议，对三所公共资助大学下放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保证政府对大学的拨款义务。这使得新加坡公共资助大学享有接近于美国私立大学的自主权，同时还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从事教育和研究。将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转化为新加坡管理大学一样的公司化的自治大学，被认为是新加坡大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认为大学将能够行使更大的自由，深入进行变革，为学生创造独特的教育经历，也有利于大学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新加坡国立大学属于公立大学。目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律依据为2005年通过、2006年4月1日施行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法人）法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orporatisation) Act) 》。该法替代了原来的《国立大学法》，目的在于将新加坡大学法人化，给大学以更多的自治权利。

新加坡国立大学被公司化后属于大学公司，是非营利性的担保有限公司。大学依据公司法登记为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有其自己的备忘录和公司章程。教育部将同大学密切合作应对当前大学法律所必要的立法变化。作为公司，大学不再受强加于法定委员会上的操作规程的限制，有更大的行政和财政自主权探索不同的方式开展教学科研。更重要的是，公司化传达了一个强烈的讯号，即大学属于其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政府。要激发一种心态的变化，鼓励大学利益相关者在大学发展规划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依赖政府指引。作为自治大学，大学能够自己制定未来计划，发展自己特色，在教育科研和服务领域追求卓越的新高度，同时基本接受政府资助。

在治理结构方面，新加坡政府认为大学在向公司化迈进过程中，需要保障必要的内部体制和过程，更重要的是有适当素质和事业心的人为大学掌舵。然而除了教育部长任命委员会之外，不需要三所大学有着一样的内部治理结构。报告认为，大学委员会要从不同角度审视其作用。应该像董事会一样运作，在大学发展和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发挥管理作用。Council中的委员会结构需要加强。现存的大学校董会结构应修正以便依据专业和贡献程度来选择成员。从美国经验来看，大学应尝试吸收能干的有激情和奉献精神的校友作为校董会成员。该报告还提出在教育部授予大学更大自主权的同时，大学领导层也应该授权院长系领导和教职员。教师能够在课程和学术质量等各种决策层面发挥积极作用。学生和校友也能在学校文化和个性孕育方面发挥作用。对每所大学来说，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加强交流和构建共同体意识，培养自身的强大支持网络都是非常关键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内设董事会等机构。

在加强大学自主权的同时，也有必要构建责任架构以保证政府资助的良好使用，有利于达成国家目标。为此，与通过公司化将大学转化为自治大学同步的重要措施就是教育部同大学签订协议。政府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大学和教育部签订政策协议；二是大学和教育部签订绩效协议；三是教育部大学质量保障制度。这些都有专门机构监督执行。



该名义起诉和被起诉、接受他人馈赠或以其它方式取得或购买和持有、批给、批租或以其它方式处置土地产业或非土地产业，并具有本条例所授予、根据本条例所授予或凭借本条例所授予的其它权力。

香港大学遵循国际的最佳方略，定期检讨其管治以及管理架构。大学的管制架构由校董会【Court】、校务委员会【Council】和教务委员会【Senate】组成，其制度组织和权责均由大学条例和规程界定。

根据大学条例及规程，校董会是大学的最高管治机构。作为监督及立法机关，由校内和校外

### 三、中国香港大学

在香港，各高等院校均根据本身的法定条例成立，法例总体上规定了大学的权利和责任、特权和构造，而这些规定的修改权只属于香港立法会。大学各自享有自主权和设有校董会，无论在课程与学术水平的控制、教职员与学生的甄选、研究的提出与进行，以至资源的内部调配等方面，都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香港大学也不例外。根据《香港大学条例》，香港大学属于“永久延续并备有法团印章的政治体及法团”，在法律性质上为公共法定法团。

根据香港《释义及通则条例》有关词语和词句的释义，并非所有的公共机构都是法团。法团包括法定法团（由条例设定的法团）、单一法团（如香港行政长官是一个永久延续的单一法团）、信托法团（“信托法团”（Trust Corporation）；业主立案法团（Owners' Corporation）；“相联法团”（Associated Corporation）；法定法团（Statutory Corporation）。

作为公共法定社团，《香港大学条例》明确规定大学禁止派发股息：大学或其代表不得向大学的任何成员派发股息或红利或馈赠或分派金钱，但如属奖赏、酬赏或特别补助金，则不在此限。

《香港大学条例》规定大学具有全权藉该名义及以

人员组成，以代表大学所服务的广大社会的利益。校董会主席由香港特首任命，董事会成员也需由主席提名，并经特首批准通过。这些成员中，有超过一半是校外的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例如，立法会议员、工商教育界知名人士等。来自校内的董事，则由校长、各学院院长以及一些著名教授组成。学校中最重要的决策均要通过校董会。例如聘请校长，就是由校董会成员组成一个专门的小组，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公开招聘。

校务委员会是大学的行政机关，并根据大学条例及规程管理大学的财产及大学事务。

教务委员会根据大学条例及规程，在校务委员会对财政的监控下，规管大学所有的与大学教育相关的事项。学校日常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学术、教学上的工作，都是由教务委员会来处理。教务委员会全部是由教授和学生代表组成，其中教授占多数。只要是在教务方面的决策，校董会都会尊重教务会的有关决定。

校监为大学的首席主管人员。校监由行政长官出任。如香港大学校监为曾荫权博士即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校长为大学的首席教务及行政主管人员。

大学设有毕业生议会，其章程、权力及特权须由规程订明。校董会内有毕业生议会代表，具体人选、人数及出任代表的条件，均由规程订明。

在政府与大学的外部关系上，香港包括香港大学在内的8所大学，都是通过有关的香港法令组建的。这些法令的修改权只属于香港立法会。香港政府设有一个专门的大学拨款委员会，通过不定期的研究评估，分配政府的教育拨款。大学办学的资金仍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入。2003—2004学年度有64%的办学资金来自于政府支持，14.9%为学费，还有7.9%是社会的捐助。

香港政府机构中有关教育机构包括教育局（Education Bureau），下设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秘书处和学生资助办事处。成立于1965年的大学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 Committee）与英国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似，其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经费调配，以配合高等教育界的策略性发展。同时，教资会在须恰当地对公众及在财务上问责的前提下，将致力维护院校的自主和学术自由。教资会致力促进各院校、政府和社会各界之间的了解，并在院校和政府当局之间协调有关高等教育的事务。教资会一方面维护院校的学术自由和自主权，另一方面确保公帑用得其所。委员会通过开放的途径与各院校和政府联络，藉以向院校和政府提供并收集两者的意见。教资会的主要职能是向受资助院校分配拨款，以及就香港高等教育的策略性发展和所需资源，向政府提供中立的专家意见。具体而言，教资会必须就政府可以拨出的款额、为配合社会需要而与政府商订每个学年各修课程度的整体学生人数指标、以及原则上各院校所同意的可招收的学生人数，向政府提出有关确实的补助金建议。此外，委员会亦就国际学术水平和惯例等事宜，向各院校提供意见。有关基本工程项目方面，教资会就院校提出的校舍发展方案和建议，分别向院校和政府提出意见，以支持院校在学术及整体上的发展。在研究方面，教资会进行研究评审工作，并向公众负责，以及鼓励院校改善研究工作。委员会十分重视其在素质保证方面的角色。过去十年，已先后进行多次友侪检讨。教资会亦促进及支持各院校推行有关保证和提高质素的措施及机制，并因应院校的角色检视其学术水平。为加强质素保证方面的角色，教资会于2007年4月在其辖下成立质素保证局。

1984年2月成立的教育统筹委员会（Education Commission）属于非法定组织，是最重要的教育谘询组织，负责就整体教育发展，按社会的需要向政府提供

意见。它在执行工作时统筹而非指导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可以取得教资会等主要教育咨询组织向政府提交的定期报告并就报告提出意见；在需要时促请教资会等组织就其职权范围内事项进行讨论。

#### 四、初步的比较结论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所有的国立大学依据《国立大学法》成为一种独立法人；新加坡的每所公立大学都有自己的法律，依据《公司法》成为非营利的大学公司；香港每所公立大学都有自身的法令，是香港的公共法定社团。这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模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在加大公立大学的自主权，探索通过公立大学的法律地位改革实现这一目标。同时香港和新加坡在强调大学自主地位的同时继续保障政府对大学的资助义务。而日本则有所削弱，以致于至今对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声音仍不绝于耳。

在大学的外部治理结构上三种大学的模式都在于采取了利益相关者模式，在政府和校方人员之外吸收校友和社会人士参与学校治理过程。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仍然互有制衡，但总体体现了一种学术和行政权力分开的理念，在学术事项上尊重教授权力，而在学校经营发展方面则强化了以校长为首的经营权，且有增加院系层级自主权力的趋势。

对此，我国在设计公立大学的法律治理的改革路径时，问题可能并不是不可以明确大学的独立法律地位，问题在于在大学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保障后，如何既规范大学的行为，又保障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和合法有效监管。大学要求独立的法律地位无非是大学要保持其独立自主，尤其是面对政府干预的独立自主，但同时面临的一个担心就是如何保障政府对于教育的继续投入。这是我国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治理结构方面可以肯定我国有必要引入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通过建立董事会或者完善校务委员会等方式，吸引校外人士参与公立大学管理，同时引进相对独立的大学评估机构。这些都需要我们对域外尤其是同处亚洲的公立大学的改革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 近十年美国的中国民俗研究概况<sup>1</sup>

黎敏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摘要】**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信息研究中心信息汇总项目“近十年美国的中国民俗研究”的一部分，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动机在于以新的态度了解、研究自我文化，为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打基础。美国民俗学在引导人们对自身的普遍知识产生兴趣、丰富对历史的认识等方面具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它的中国民俗研究在研究对象、方法上为我们的民俗研究提供更多的思考，它的民俗学组织形式也为今天我们建立为社会生活服务的民俗学机构提供借鉴。

**【关键词】** 民俗 民俗刊物 研究信息

民俗是民众生活世界的体现，生活世界是日常实践的领域，是蕴涵着一个共同体中普通人的本源性文化价值的基本领域。在中国社会日益发展变化、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希望真正地理解我们自己，就必须寻找进入中国人生活世界的路径。而理解了置身其中的共同体的生活世界，才有希望理解自我，才有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这是本课题把“民俗”作为关注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课题的研究为民俗学研究的基础研究。民俗学是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遗产的社会科学。民俗学研究者高丙中在谈到社会科学问题时说到：“关于社会的学问，应该落在社会的大众身上。一个值得尊重的社会，是其中的大众值得尊重的社会。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有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就是提供能够让这个社会因为它的人民的价值和行为方式值得尊敬而获得热爱(对内)和尊重(对外)。”<sup>2</sup>我很认同这一看法，而这也构成本课题选题的原因之一。中国民俗学伴随着西学传入产生于“五四”时期。由于历史条件，当时包括民俗学在内的几乎全部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研究指向，即要改造至少劝说全民放弃我们固有的“落后”的生活世界，“更新”为符合强大的西方标准的新生活世界，由此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自我否定的思潮，这种思潮不仅在“五四”时期表现突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能看到它的影子。它的负效应在在于，摒弃了

中国人生活世界的现代化设计，无法避免地会与中国人的生活发生矛盾、不适甚至冲突。因此，在民众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是该回到我们无法操纵的生活世界，以学术的眼光探究这个世界的面貌、理解它运作的方式、审视其价值取向的时候了。我们关注的民俗应该是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桥梁，而不是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

我们最终目标是了解中国的民俗，但是本课题选择对美国近十年的中国民俗研究作为切入点，其中的学理原因有如下考虑。从世界民俗学的发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英美民俗学、德日民俗学、中国民俗学。英美民俗学是在其社会飞速发展过程中，传统社会中的民俗发生演变的情况下兴起的，学者自然多以被新社会形态边缘化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因此，在英美民俗学发展之初，很多学者对遗留物问题的研究非常热衷，其优点在于，它引导人们对生活的普遍知识产生兴趣，对历史的认识也由此得到丰富。我认为这正是目前的中国民俗学在研究中国民俗问题时所应秉持的一种研究态度。因此，本课题希望以基础性的搜集工作为起点，观察近十年美国对中国民俗研究成果的基本情况以及美国民俗学机构、刊物的发展现状，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提供借鉴，特别是为今后中国学者在借鉴他们研究的问题、方法、研究态度上提供方便。

本课题一方面把在美国发表的关于中国民俗的研究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信息汇总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2 高丙中：《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载《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

成果作为考察对象，另一方面，为弥补异地搜集信息源不足的缺憾，我们补充搜集了中国出版的美国学者近十年涉及中国民俗的研究著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在美国民俗学研究机构现状、美国民俗学刊物基本状况、美国的中国民俗研究成果、中国出版的美国学者近十年关于中国民俗研究的译著等几个方面都有了初步的搜集成果，现集中介绍如下。

### 一、美国民俗学研究机构发展趋向

1881年成立的美国民俗学会是美国最早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它一直吸引着接受过民俗学专业教育的学者参与其中。那些得到博士学位的人主要在各大学的文学、人类学、亚洲研究、非洲研究等专业方向从事教学工作，由此形成了美国民俗学学院派的代表。目前，美国民俗学会已经拥有1000多名注册会员，而且他们中间1/8是非美国本土的会员，由于分布于世界各地，所以，他们的研究也就不限于美国，这一点在关于中国民俗的研究上也有所表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民俗研究机构中的一个新的类别逐渐形成。这一类别主要从事公众民俗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其机构被统称为公共民俗研究机构，其成员被称为公众民俗研究者。1990年，联邦政府规定，各州都要在州级机构中聘用专人从事公众民俗方面的工作，使这一派的研究者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而且逐渐成为美国民俗学研究中的主力。其成员遍布于从事公众民俗学工作的各类机构中。这些机构，有的是政府机构、州级机构，也有的是NGO，像国会图书馆、史密森博物馆、国家人文基金会、国家艺术基金会等，都是从事公众民俗具体工作和研究的重要机构。类似的州级公众民俗研究机构有34个，郡县级的公众民俗研究机构有75个。由于机构的性质不同，它们的运作方式也不同。除隶属于政府机构的公众民俗机构外，其他公众民俗研究机构中很多是从一个独立的民俗研究项目开始，逐渐发展为NGO，由此得到国家人文基金一类的资助而发展起来。目前，在美国民俗学会的成员中，有45%的学者是公众民俗学者，55%是学院派民俗学者。虽然后者在人数上略占优势，但是，联邦政府的政策促使这些学者务实地与公众民俗学者合作，同时也使自己的研究与公共民俗事业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民俗学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而具有回归民间、服务民间的趋向。

### 二、美国主要相关期刊刊载中国民俗研究的情况及其研究特点概述

对于美国期刊上关于中国民俗的研究成果的搜集，本课题是在下面的范围内展开的：首先集中于对美国民俗学界权威刊物的搜索，不限定成果作者是否为美国公民，只要其成果刊载在美国的刊物上或在美国公开出版，就意味着美国学界对其所研究的问题有所关注。在民俗类型上，本课题所搜集的信息涵盖了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信仰、村落民俗、物质民俗、岁时民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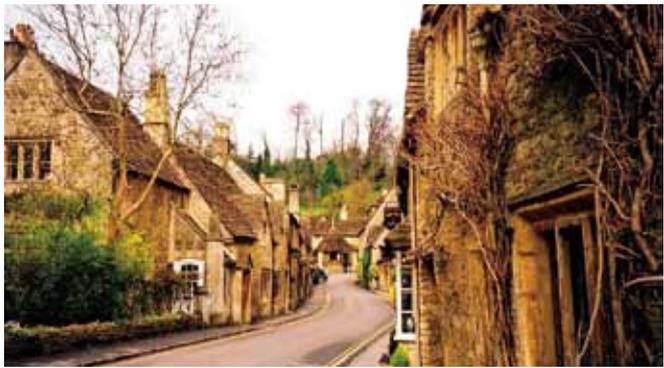
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数据资源、北京大学图书馆数据信息资源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我们对目标刊物进行搜索，结果发现，一些传统民俗学刊物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停刊。只有1964年创刊，1983年更名为*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的民俗学权威刊物延续至今。该刊为美国民俗学会的会刊，原名*Journal of the Folklore Institute*。作为一个权威刊物，它不仅吸引着民俗学研究者，也吸引着相关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学者，他们从各自的领域参与探讨与民俗相关问题，其成果包括前沿的理论探讨、当下的热门问题、田野作业方法、民俗学史研究等。而且，不同国家研究者的参与也使该刊呈现国际化的色彩，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际民俗学的研究特点。但遗憾的是，在对近十年该刊刊登的研究成果进行搜索后，我们仅发现一篇2006年由天津财经大学学者Lemei Yang发表的“China's Mid-Autumn Day”（《中国的中秋节》），该文主要介绍了与中秋节相关的、在中国流传很广的两则传说，对中秋节的发展情况进行考证，对当代中国的中秋节风俗进行描述。应该说，这对国外学者了解中国的中秋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关于中国民俗的更深度、学术价值更高的研究成果并未在这个权威刊物中展现。

在另一本美国民俗学的重要刊物*Western Folklore*里，与中国民俗相关的研究，近10年来只有9篇。虽然收获不大，但是，我们有了一个总体印象，即相对于对国外的研究来说，美国学者的研究兴趣更多的在于对本土的、现实的问题进行研究。

这样的状况使我们不得不对搜索的对象和范围进行调整。我们将搜索的范围扩大到与民俗学相关的学科——人类学和社会学，对美国相关领域的权威刊物进行了检索，其中包括*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Current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是美国人类学协会的核心刊物，一年4期，每期除总发刊词外，一般刊登几篇核心论文，此外，它注重在较广的范围内对一些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的热门书籍进行评介。*Current Anthropology*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刊物，在美国人类学界也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刊物，一年5期并附一期增刊，设有评论、讨论和批评、报道、书评等几大板块，它相对热衷于刊登历史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而对中国的相关研究涉及较少。

在以亚洲为研究对象的刊物中，*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当属最具代表性的刊物了。该刊在哈佛燕京学社支持下，于1936年创刊，它的创办宗旨在于促进高等教育中，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其严格的审稿制度，使该刊的研究成果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从其历史看，它有傲人的汉学研究传统。目前，中国仍是它关注的重点之一。从近十年刊登在该刊上的与中国民俗相关的研究看，它还保留着美国民俗学关注民间叙事文本的传统，被搜集到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关于民间叙事文本的研究，如Sarah M. Allen的*Tales retold: Narrative Variation in a Tang Story*、Carrie Reed的《平行的世界、延伸的时间与虚幻的现实：唐代故事“杜子春”》（*Parallel Worlds, Stretched Time, and Illusory Reality: The Tang Tale “Du Zichun”*）。两者都从纵横两个维度对同一故事的不同异文文本进行比较，探寻民间叙事文本的演变脉络和影响其演变的因素，前者肯定了文人在记录故事时的创造性，后者发现外来的故事在中国流传过程中是如何适应新的讲述环境而发生变化的。在方法上，除了这类文献钩沉、分析外，他们非常注重民俗学基本方法的运用，这体现在他们对田野作业方法的重视上。如Anne E. McLaren所著的*Performing Grief: Bridal Laments in Rural China*一书中，对中国长江三角洲沿岸、上海东部的南汇县曾经流传的哭嫁歌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耄耋老妪潘采莲演唱的哭嫁歌被南汇县文化局干部记录下来。1994年，当Anne E. McLaren在这一地区进行田野作业时，潘采莲老人已经去世。Anne E. McLaren在采用文化局的记录文本的同时，还对潘采莲的亲戚及当地其他居民进行访谈，将自己亲自在场收集、亲耳听到的局内人、局外人参与仪式过程的行为事实的口述文本和局内人、局外人在彼时彼地收集、考察的历史事实的书写文本相结合，以表演理论为基础，通过潘采莲的哭嫁歌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南农村的社会生活，认为哭嫁歌承载着严肃的仪式的作用，在中国的农村，结婚经常被看作是危险的过渡，有



受到嫉妒人类幸福的邪恶精神力量侵害的潜在可能，哭嫁歌采取克制的原则，期望通过对悲伤的戏剧性表现带来一段幸福的婚姻。她的研究受到关注，Erik Mueggler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发表评论，认为Anne E. McLaren虽然走访了南汇并采访了一些当地居民，但是她没能参加这种哭嫁歌的民俗志调查中，使其论据显得零散，没能使她的论点更健全、更具说服力。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民俗学界的研究已经突破单纯的记录文本，而是更加注重对在一定表演情景下的口头叙事文本进行研究，考察一个口头文本在特定的民俗场景中是如何形成、如何发挥作用的，这自然对研究者的田野作业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田野作业获取的材料是否真实可靠，是一项研究是否具有说服力的前提。

这几个刊物上的研究有其总体特点。从人员的构成上看，其研究者大多为中国本土研究者，他们或本身多年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或得到美国研究机构资助，对特定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并对田野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从研究对象看，这些成果的最大特点是系统性。这突出体现在*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上，该刊经常聘请中国学者做执行主编，每期经常针对特定地区展开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专题研究，如内蒙古、西藏、彝族地区、福建、广东、云南等地都进入了该刊的观察视野。同时，它还对中国人人类学的概念、发展趋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由于关注问题的相关性，这些研究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思考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问题，因此，我们也收录了这类研究，共7项。在对这些刊物上刊载的与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相关研究中，我们遴选出其研究内容涉及到中国民俗的研究成果，共计82项。

### 三、国内译介美国学者研究著述中近十年关于中国民俗的研究情况

本项目在实际进行中发现，由于异地搜集信息，在

时间和经费上带来了很大不便，对近十年美国的中国民俗研究方面的专著搜集非常困难。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将搜索的领地设在了国内，即对国内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近十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搜索，从中寻找到与中国民俗有关的著述。

这方面的搜集卓有成效，在170多种图书中，我们首先选取近十年出版的美国学者的译著，再从中选出其写作时间在近十年的成果。这一步的困难在于，有些著作并未标明写作时间，对此，我们将出版年限作为参照标志，即如果其出版时间在近十年，则被视为我们的搜集对象。但是，这样获得的信息比较有限，所以，我们把搜索时限扩大到1990年至2010年。这样，我们获得了13项目标信息，它们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对中国民俗事象的研究。如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中，收入八位学者的九篇研究文章，涉及民间宗教组织，民间对天后、关公、五通神、碧霞元君、孔夫子信仰的历史、演变、仪式，民间信仰与官方政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王斯福著《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是在他在台北三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写成的人类学力作，揭示民间信仰的象征性隐喻是中华帝国与民间沟通的重要方式，也是民间创造性的体现，他的研究涉及了对官方与地方的崇拜体系，节庆活动及其仪式等的分析。杜赞奇著《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意在研究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等深入社会底层的，作者虽无意探究其中的民俗生活，但是却从另一个角度为考察民俗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范例。芮乐·韩森著《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以中国古代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与契约”为研究对象，广泛研究了流行于民间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中很多是民俗习惯法。伊沛霞所著的《内闾：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以宋代妇女生活为研究对象，涉及宋代的男女之别、婚姻的意义、婚礼仪式等；韩书瑞所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以18世纪的中国为研究对象，对那个充满活力的时期做了细致的研究，其中包括亲属关系、村落组织、人生礼仪、年节礼仪等。

从这些著作成果看，它们经过中国学者的筛选被翻译成中文，本身就意味着它们具有特定的学术价值，能够代表美国近十年学术的趋向、特点和理论思考。细数这些成果，就研究时限来看，美国学者的研究几乎遍及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但明清及近现代、当代的研究明显更多，这与这些时期的资料相对较丰富有关。在研究范围上，美国学者的研究广泛涉及了中国社会历史、

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研究大多建立在丰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基础上，通过对材料的剥丝抽茧，探究它本身以及它与其他材料提供的信息之间的关系、意义，再佐以恰当的理论分析，显示了他们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洞察力，这些使他们的研究详实、扎实，因而往往在特定问题上具有突破性，其研究方法甚至成为一种范式。在研究取向上，这些成果显示，近十年来美国学界的研究兴趣发生了转向，即从对上层文化权利的研究，转向对“底层历史”的研究，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这种转向使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们将研究视野转向普通人的社会和文化，于是，民间组织、具有传承性的民众观念、家庭行为以及村落生活模式等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这一方面使民俗学的研究队伍呈现多元化，另一方面也为专业民俗学者拓宽了研究视野，由此带来的是美国民俗学研究的良性发展。当然，这同时带来的是对学者要求的提高。从整体看，近十年美国学界学者个人的研究素质更趋综合化，即他们的研究中不仅注重对历史背景、历史因素的分析，同时还有田野作业、民俗志材料作为辅助、补充，后一类材料的运用，更有助于阐释下层文化的意义，使很多研究兼具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特点。

虽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搜集的信息还较为有限，但是，它们基本能够体现近十年美国民俗研究的特点以及美国对中国民俗研究的概貌。这不仅实现了本课题的预计目标，而且也能从中发现很多值得思考、值得借鉴的问题与方法。比如，美国民俗学会的发展状况就启发我们，在学院民俗学的范围之外，民俗学的研究可以直接为公众的社会生活服务，它的意义在于，在理解了自我生活知识前提下，改造生活是基于对民众生活方式和价值的尊重而进行的，是对生活世界的热爱，这迥异于我们以往对“改造生活”的理解。同样，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民俗学以其独特的方式涉足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为诸多社会科学提供了学术支持。如前所述，我们在搜集信息时发现，很多学者并非民俗学专业学者，但是他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围绕生活世界这个民众生活最重要的场域，这不仅说明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它昭示了：了解一个共同体，走入它的生活世界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和局外研究中国民俗不可避免地持有的那种批判性不同，在审视局外研究者的批判性的同时，中国学者的民俗研究有责任更多地建立自我文化的表述意识，从而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创造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和欣赏的条件。而实现此目标的重要一步就是了解我们身置其中的生活文化——中国民俗。

## 全英中国学研究所<sup>1</sup>



全英中国学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是由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以及艺术人文研究委员会共同拨款建立的一个国际性的高级研究中心。研究所成员有来自利兹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的专门从事东亚研究的专家和学者。

过去四十多年来，利兹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一直致力于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现代汉语教育和研究工作。这两所大学在语言教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资源共享的方式，并由此成为了中国学的高级研究中心。全英中国学研究所将这两所大学的学者们组织在一起，从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这四个大不同的方面对现代中国进行研究。

全英中国学研究所现任所长是Flemming Christiansen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农村发展及城市进程等。目前，研究所共有35名研究人员，自2006年研究所成立至今，他们已发表各种论文、著作几十种，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Chris Bramall的《中国农村的工业化进程》(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ral China)、

Jieyu Liu的《中国城市里的性别和工作》(Gender and Work in Urban China)等。近期，研究所还将举办一系列汉学讲座，包括“中国的阶层和阶层意识——维吾尔族人的社会阶层观”、“个人财富和传统角色：中国的女性企业家”等，面向全体师生开放。

除了定期讲座之外，全英中国学研究所每年还组织“汉学研究暑期夏令营”，在中国的南京、英国的利兹和布里斯托以及挪威的奥斯陆等地开展活动。这项活动主要是向来自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澳大利亚以及北美国家的博士研究生们提供汉学研究方面的培训。同时，全英中国学研究所还是世界大学联盟(the 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当代中国中心秘书处的主持者。

凭借与中国的联谊学校之间的良好关系，全英中国学研究所有着丰富的资源，为研究学者、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们提供各种汉语以及其他汉学知识的培训，使得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

<sup>1</sup>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2日。



##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栖霞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韩慧英

E-mail: [icwar@bfsu.edu.cn](mailto: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